

重庆出版社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
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





重庆掌故



王秉诚　著

重庆出版社

一九八六·重庆



前　言

著名评书艺术家王秉诚，本名刘玉声，祖籍江西卢陵县。一九〇〇年三月生于重庆，一九五三年病逝，年仅五十三岁。

王秉诚先生，在评书艺术上造诣精深，以清谈闻名，自成风格。对四川评书艺术的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，这是人们所熟知的。其实，他不只是一个评书艺术家，而且是一位著作家。一九二六年，王秉诚先生就以“然然”为笔名，在当时的《重庆晚报》上发表了长篇警世小说《如此江州》，全稿长达三十万字，连载两年之久，引起了社会各界的普遍注意。一九二八年，又在《东方晚报》上发表了《如此江州》第二集。一九四七年，王秉诚先生用刘玉声的名字，还发表了长篇小说《巴渝春秋》。

王秉诚先生那时的社会职业是报纸记者，除了履行记者职务外，就用王秉诚的名字挂牌说书；同时，还用“阿顺”、“琅琅”的名字，在报纸副刊上发表了大量的重庆风物传说。一九四八年，他将其中部分作品编辑成册，以《重庆掌

故》为书名出版，四十至五十年代，在重庆地区，流传很广，几至家喻户晓。这些掌故，具有浓厚的地方色彩，幽默风趣，语言流畅，既可供阅读，又可供讲述，真是雅俗共赏，老少咸宜。遗憾的是在十年动乱期间，这些作品大量散失，现在很难找寻了。

党的三中全会以来，党中央拨乱反正，纠正“左”倾错误，恢复和贯彻了党的“双百方针”，提出了抢救民间文艺遗产的号召。为了响应党的号召，提供民间文学研究参考资料，同时为了丰富群众文化生活，一九八二年，在重庆作家协会和重庆出版社的关心和支持下，我们开始搜集王秉诚先生的遗作。

历时一年，共收集王秉诚先生的作品百余篇（未包括长篇在内），近三十万字。现在选出三十六篇短小作品，辑成第一集，仍用《重庆掌故》书名出版。这些作品，不仅是优秀的民间文学遗产，而且对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者们，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。

在编辑过程中，我们尽量保持原貌。仅对明显错落处作了个别校订；残缺部分，请王秉诚先生之子刘怀靖同志，根据记忆作了补充。个别标题，根据内容，也作了技术性的改动，并在该篇末尾作了附注。

这次搜集整理工作，得到了四川省图书馆、重庆市图书馆、泸州市图书馆等单位的帮助，尤其是北碚区图书馆，提供了更多的材料，在此一并致谢。特别应该提出的，这次搜集整理工作，得到了王秉诚先生之子刘怀靖同志的大力协

助，花了将近半年时间，查找资料，抄录遗著，没有他的努力，这本书也是难以奉献给读者们的。

我们能力有限，水平很低，在编选工作上，一定有不少缺点和错误，希望能得到广大读者和专家们的指正。

傅　则、黎民苏、蓝前华

一九八三年四月十日





目　　录

金竹寺在哪里

在重庆城区内的庙堂，原有“九宫十八庙，三观不出城”之说，这是很多本地人都知道的。此外还有一座“金竹寺”，据说乃巴渝大丛林之一。这个名称，知道的人也不少，而且尚有关于“金竹寺”的一些故事流传着，每在茶余酒后，常听见讲说起；更有不少外地来到重庆的人，习闻此名，特别提出询问。但是这一座“金竹寺”究竟在重庆什么地方呢？又是什么模样呢？却说不清楚。

其实“金竹寺”，乃是巴渝流传的一则神话，根本没有依据，更没有人到过那里，不过这一则神话讲起来相当奇趣动人，便觉有源有本，信而有征，又因为流传久远，人所咸知，就更加神乎其神了。

“金竹寺”为渝城一大丛林，建筑年代甚古，命名的由来，是因为寺内生长一种“金竹”之故。地点就在朝天门外，扬子、嘉陵两江交界之处，也就是大小河汇流的夹码水下面。若干年前，那里原是一个小山堡，凸出江面，河道并不如现在的宽大，“金竹寺”就建筑在上面。一座大石拱

桥，连接着小山堡与朝天门码头，走完码头石梯，上桥，再下桥，便到这“金竹寺”大山门外的月台坝。某一年秋季大小两河水枯，发现江心似乎有一件东西荡漾着，人们乘了小船前去察找，才知道是一个石刻的金瓜露出了水面。那就是“金竹寺”前，桥拱栏杆上的石刻饰物。并且有人不但明白瞧见巍峨壮丽、庄严伟大的庙相；更远与寺中僧人交接言谈，真个言之凿凿。

这故事的产生，是在清代道光初年，四川还没有设立邮政，虽然商贾云集，人事频繁，对于信函的寄送投递，却不似今日这般便利迅捷。其时，重庆只有一家信行，招牌叫做“曾参昌”，备有专夫，往来省内各州县。一次，由成都赴重庆的信差，由东大路来渝，正走到石桥铺，不料天已入晚，虽然这里距城仅有二十余里，但是所有携带，多系各商号的汇条兑票，黑夜郊行，恐生意外，遂决定就此留宿一宵，次晨赶早。

石桥铺原是东大路上一座乡场，通衢所在，那信差上店房投宿之时，已经满号，早莫得空房了。好在那信差往来渝蓉既久，对于乡镇店房，皆甚熟悉；店主人却不过，想到屋后进的一间小房内，虽已有一过路僧人寄宿，还有一床空着，便着那信差去与僧人合号。

这个体格肥胖、慈眉善目的和尚，一副游方行脚的装扮。信差既然与他合号，彼此便闲谈起来，由此信差虽然不知道僧人是从什么地方来，却知道了他是到巴县西里华岩寺去的。僧人也知道了信差明晨便要到达重庆，即由所带的背

夹内取出一封信来，请托顺路代交。僧人还说："彼此能在今宵相遇，又能同住一处店屋，又是合号，实属缘法。"信差认为这是一件顺路之便的小事，极口允诺，愿意帮忙，接过信来一看，封面写着的是"交渝城朝天门外，金竹寺，某某大师收"，更觉交送方便，因为重庆"曾参昌"信行，地址在城内陕西街，距离朝天门甚近。

跋涉长途的信差，是非常疲劳的，明晨又须早起，所以先自睡觉了。半夜里，信差曾经醒过来一忽儿，他看见那僧人并未睡下，却是盘着双脚，在床上闭目参坐。最令人稀奇的是，正当腊月寒天，僧人竟脱去了外衣，赤裸着上身，丝毫不觉得冷冻。尤其令人惊异的是那僧人竟受了体戒：由胸腹绕围两肩，显明的露着一圈火的戒疤，好似挂着朝珠一样。

次日晨早，那信差便起身预备赶路，他以为自己是最先动身的一个，却未料到，更有早行者，僧人已经先行离去了。这也是很寻常的事，信差并不感觉怎样稀奇；各自上路，直趋重庆。

二十余里的途程，不需要多少时间，那信差很快的便到达重庆。依照信行的规矩，先把信件向行里交缴清楚，了结自己的手续责任，公事即告完竣。于是洗澡吃饭，舒展一下长途跋涉的辛劳，直到当天下午，他才忽然想起僧人托带的那一封交"金竹寺"的信件，好在已经空闲，便信步走向朝天门外去。

那信差满以为这是一封交送极为方便的信，朝天门是大地名，"金竹寺"既是一座丛林，自然为显著的庙宇，投递

不会困难的。万想不到，到了朝天门，却遍问不得。当地的人们，根本就没有一个知道哪里有"金竹寺"这座庙宇。他觉得诧异了。但是自己终以为这"金竹寺"绝对不会没有，也许是一座小庙堂，并不十分为人注意，所以寻找艰难，他只得自行觅找。走遍了朝天门外所有地面，右至东水门，左迄千厮门，结果依然不得其处，甚至"金竹寺"这一个庙名，也无人知晓。

费了很久的时光和不少气力，那一封信，终于不得其寺而投。那信差还是不以为怪，他认为这是不熟悉的缘故，决定不再枉自劳苦了，把那一封信带回信行，转托行里交送本地函件的同事代为投递，岂不就行了么。这个主意是不错的，于是折返城内，打算转归信行，哪知天色早已入晚。在那时候，城门每到夜间二更便要关闭，除掉官衙的差事，任何人皆不能通行；信差只顾探问"金竹寺"的所在，却没有注意到时间的迟晏，及至返身折回，方才明白已经关城，不得其门而入了。

朝天门外大码头，靠左右两侧的竹捆房屋，早年都是开设的小客店，每当天色入晚，挨门挨户全挂出"未晚先投宿，鸡鸣早看天"的长方灯，每一家的柜台上，还照例燃着用白纸糊罩的三角灯，这是所谓"鸡毛店"的特别标志。那信差便投向一家店里住宿。他在柜台前，办好了写号落名、给钱、领被盖手续之后，偶然想到店房主人是长居此间的，谅必知道"金竹寺"的地点，于是他就向柜上的人问询起来。

出乎意料的，店房主人竟也不能答出，并且说："我们

由祖上一辈，就在这里开店住落，算来三代，已经一百多年了，却未听说朝天门外有什么‘金竹寺’呀。”

那信差无奈，只好仍待明日照想定的那个办法去办。他已经疲倦，打算抱起被盖进房睡觉；哪知他和店主人的谈话，着旁边长木凳上坐的好几个闲人所听到。其中一人，忽然对他说，“金竹寺！你看，那不是正有金竹寺的人来了么？”一面说，一面还用手向店房外边指去。他赓即转头向外，顺着那人手指的方向望去，果然瞧见有人提了一对圆灯笼，正朝码头上面拾级而来，圆灯笼上，明显的映着三个红色大字：“金竹寺”。

“踏破铁鞋无觅处，得来全不费工夫”，这真使那信差高兴极了。他自然不肯放过机会，急忙跑去迎着来者。及至彼此接近，才看清楚提着圆灯笼来的，正是一个和尚。他向其诉明来由，及寻觅之苦，叩问道：“宝刹究竟在什么地方？”那和尚听罢，很从容的返身指着下面答道：“那不就是金竹寺么！”他又顺指处望去，这可更使他发呆了。

近在眼前，一座巍峨宏丽的庙宇，矗立在一处凸起的小山顶上。正面大门外，为一宽阔的月台，有石桥接连着码头石级尽处，由此直通庙内。至于庙的两厢和后背，以及月台的周围，却都是参天的丛林，庙宇伟大而壮观，宝顶似乎是磁郭铜瓦，光彩昭然，触目生动。那信差瞧着，又是怪异，又是高兴。高兴的是，毕竟寻到了这“金竹寺”的所在；怪异的则是自己未免太忽略，就在近处的一座大庙，居然费了那么多力气不曾找到；尤其是此地人们，也竟会一个都不知道。

他别了和尚，立即前往，下完码头的石阶，经过那座大

石拱桥，再穿过光滑平坦的月台，便到了寺前的大门。只见庙内的正殿大廊悬挂着一列珠灯，照耀明朗，殿内隐然有钟鼓祷器的声音传出，也许正在做着法事；殿前廊下，不时有僧人走过，个个静默而行，没有丝毫乱混的声响。真是严肃圣地。那信差站在门外，只顾瞧望，不便走进。忽然一个沙弥看见了他，很奇怪似的走来询问："到此何事？"他即说明来由，并取了那封书信，交与沙弥，请其代为转递，这事终算办完善了，他赓即返身，预备离去。

可是他心里不免感觉奇怪，怎么这样宏大一座丛林，竟会无人知道呢？他一面走着一面各处张望，便又发现一种奇妙的东西，就是庙的周围，所有丛林全是植的竹子，并没有一丝别的杂花草木混生其间。特别是竹子的颜色，非绿而为黄，且金光闪闪，俨然黄金一般。他想自己常年过州走县，也曾跑了很多地方，看过不少种竹子，却从来未遇见过这等金色的竹，真可算得异品；正好折取一枝，也可当作证据，给人们看看自己终于找到了"金竹寺"，并非冒假。他如此想着，便顺手采折了一枝带回店来。这时夜更深了，店房里的人大多睡去，他也各自走进房内，把那竹枝随意地藏在枕下，倒身床上。

小客店里清晨照例是起得很早的，信差更习惯于见亮即起，可是信差起身出来，店房主人却已经比他先在了。他忍耐不住，用责备的口气向店房主人谈到"金竹寺"，质问道："昨夜我终于找到了那里，并且就在你们店房的右手下面，近在咫尺，为什么我特地请问你，却反而回答说，三代

一百多年来都在此处，却从不知有这样一个庙宇呢？”店房主人听了他的话，竟大不服气的反问道：“真的有‘金竹寺’，你昨夜还到过那里么？而且就在我们店房下面吗？”说着，便用手向外面下边指着：“请你仔细看清楚，那是金竹寺吗？”那信差更不服气的立即向下一观，不看则已，一看之下，可把他骇得目瞪口呆，不知如何讲话了。

原来下面乃是茫茫的大河，正是扬子、嘉陵两江交流之处，不但没有什么庙宇，连小山堡、石拱桥也杳然无迹。然而信差清清楚楚的记得，昨夜实实在在是去过那里的，一切经过都很明明白白，怎么仅隔一宵，竟有这样神奇莫测的大变化呢？他弄得惊诧莫名，无以自解。店房主人不免笑他神经混乱，言语无稽，就是旁边的人，也无不认为是胡讲瞎道。

他猛然想起了一件东西，可以给他帮助证明，立即从枕下取出了那一段金色竹枝来，以示自己所说并非虚诳。哪知这时再看那竹枝，却并非植物，乃是一枝真正的黄金竹子啊！于是人们都认为遇见了神仙，到过了仙境，不但是缘法，而且是造化。这一枝金竹，正是神仙托他交信所付的酬劳，可算一件宝贝。

关于“金竹寺”的存在，就是由这神话传述而来。还有人说，那信差在石桥铺所遇见的僧人，乃是“华岩寺”丛林开山的圣可祖师，因为当时正值腊月，为“华岩寺”每年传诫的时期，圣可祖师许是回山主持法会，因此留下了这样一个事实。

1946年《重庆掌故》

金子门与金鸭巷

神话传说，流行各地，而任何一地，又各有其特有的神话传说，内容情节，虽不免涉及迷信无稽；但也有不少关系地方历史，反映一般人民的爱憎，和表达善良愿望的内容。查其来由，也并非事出无因。旧时神怪之说，甚为风靡，不但一般人相信，许多有文化知识的人也为之记叙传述。于是，更显得确有其事，辗转流传，俨然事实了。

渝城金紫门，相传为巴渝金库所在，亦即天财地贮之所，故又写作“金子门”。因为由这里出城向右不远，正当城墙下面，有一带如刀切斧劈般雄伟高峻的石崖，崖下丛生灌木野花，在石崖高处，有一道圆形石纹，本系天然形成，很象一道门户，这便是“金库”的大门。至于库内是什么样子，贮藏了多少财宝，则从来无人进去看过，不得而知。只道库内藏有一头金牛，并有专门担任守卫金库的天神保护；一般人是无法看见的。那么，人们又怎样知道金库里有一头金牛呢？原来，在清代闭关自守政策下，中西隔绝，一般人视欧美人为异物，称为“洋人”；并传说“洋人”具有特异功能，

能识宝物。于是乎见其深入内地，便认为是来寻探宝物、盗取珍异的。上述说法，也并非纯属无稽，外国人确有盗取我国文物古籍的，于是愈传愈真，“金牛过江”便是本地民间盛传的这类神话故事之一。

南纪门外的珊瑚坝，搭着不少席棚竹屋，自来便为贫苦人聚居之处，又当码头渡口，在枯水季节，便形成一条河街。这里住着一对孤苦伶仃的老夫妇。这对老夫妇没有亲戚儿女，就此二老，相依为命，靠推豆腐售卖维持生活。每天老婆婆在家煮豆浆，老头儿则挑着上街售卖，清早出门，午后归来，苦挣苦活。

一天午后，已近夕阳西下。老头儿挑着豆腐担子走街串巷，劳累了一天，慢慢返回家去，正经过满地卵石的河坝。他高一脚低一脚地走着，无意中看见有一个大鹅卵石，颜色黄紫，光滑闪亮，十分可爱，平日极少见到，心想捡回家去，镇压床席，倒顶合适。于是，老头儿俯身拾起，顺手放在豆腐筐里，挑回家去。

这个卵石放在床头，已经数月了。白天用它来榨豆腐，晚上用它来压席角，两老并未怎样珍视它。哪知一天上午，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，从南岸渡江入城，来到珊瑚坝河边，拄着手杖，沿河街缓步而行。到得豆腐棚前，他忽然停住不走了，象发现了什么稀奇似的，不住地用眼向棚子里瞧望，并走进棚里去，指压在豆腐箱上面的那个大卵石问道：“这东西可以出售么？”老头儿心里揣想，他买这东西有什么用处呢？忽然记起人们平时谈起洋人识宝的事，也许这卵石是什

么宝贝，所以他才愿意出钱购买，便随口答道：“可以卖，要一百两银子！”哪知洋人听了，十分高兴，并不还价，要老头儿带着卵石，一同到他家里去取银子。

到了那洋人住处，放下鹅卵石，洋人付了一百两银子。老头禁不住好奇地问道：“你花这么多银子，买这个石头儿有什么用处？”洋人哈哈大笑道：“值得，值得。这卵石是打开金库的钥匙．有了它，重庆金库的财宝便全都属于我了。你说，一百两银子买它不挺值得么？”老头一听这鹅卵石是打开金紫门外金库的钥匙，洋人有了它，金库的财宝便全归他了，这还得了？便抢过卵石，抱在怀里，把一百两银子放还桌上，口里说：“我不卖了。”

洋人不依，二人便到了县衙门，请县大老爷裁判。县官听说是关系到洋人的官司，连忙升堂问案，询明原委，便判道：“洋人最守信用，老头既将卵石卖与洋人，岂有再收回之理？着卵石仍归洋人，所付一百两银子，亦罚还洋人，以示赔礼道歉，辨明是非！”

那洋人得到卵石之后，正待第二天晚上前去盗取金库的财宝，库里那头金牛，却已经受到专司看守之神的保护，离城到对河南岸去了。洋人手持卵石，叫开洞门，结果空空如也，什么也没有找到，枉自劳力费神一番。

那天凌晨，金紫门外大码头，忽然有人呼叫渡江。当时，每晚二更以后，各码头即告收渡，但有专门值班的渡船，名为“差船”，听候官府差遣，以便有要事或传送紧急公文时，官差渡江之用。“差船”虽然专为官府准备，但在平时情况

下，既然有船夫在此通宵值班守候，遇到一般平民百姓有急事要求过江也同样给予摆渡，反正收取船资；不过，因为是在夜间，又是专船往返，收费高于白昼而已。金紫门对岸上坡，便是南城坪，深夜偶尔有人过江，并不为奇。

守候差船的船夫听见有人呼叫渡江，口音不象是官府的，而且天气寒冷，在睡梦中被叫醒，本不十分乐意；便答说若要过江，须付来回包船费。哪知岸上满口答应。船夫无可推说，只好起身摆渡。

半夜后，寒雾漫漫。渡船搭上跳板，才见上船来的人，原是一位四十余岁的中年汉子，庄稼人打扮，身后牵着一头黄牛。船夫心里很不高兴，因为牛大且重，容易把船踩漏；再者，推起来也很吃力。但既已答应摆渡，此时也不好推拒，只好照应这一人一畜上船站好。

船只离岸，向上游撑了一段，便向对岸划去。那中年人牵着牛鼻绳，站在舱里，默不作声。船夫心想，这么夜深，还牵牛过河，况且从城内牵往乡村，真是古怪，忍不住问道："老兄从哪里来？这么晚牵着牛到哪里去呢？"

那人淡淡的答道："这是主人养的放生牛，我是受雇照应它的。主人听说有人要来盗取，因此叫我牵到南岸喂养一段时间。"

船夫听了，深信不疑，便不再问了。两人一面摆谈，一面推桡，小船到得河心，黄牛忽然拉起粪来，登时撒了一舱板牛粪。牵牛的中年汉子忙向船夫表示歉意，连道半夜劳神辛苦，又把船弄脏了，很是过意不去。船夫本来有些不高兴，

听他这么一说，不便发作，便说："没什么关系，靠岸后你各自上坡，我舀水冲洗了就是，河下顾不了这么多。"

一会儿船靠岸了。船夫搭好跳板，让那汉子牵牛上岸。此时雾更大了，船夫用篙尖倒钩抓住岸边乱石，好让人畜安全上岸。哪知中年人却头也不回，牵着牛对直向坡上走去，并不提付给船钱的事。船夫丢了竹篙，急忙追去，却踪影全无，十分生气，暗想这是安心不给船钱。返身回到船上，一眼瞧见舱里的牛粪，更觉冒火，分文未得，还要打扫船舱！边气边卷起衣袖，用水箕槽斗（一种木板做的，专为舀出舱中积水之用）撮起牛粪，抛入江中。尚未打扫干净，天色渐亮，这才瞧见洒掉在舱板上的牛粪，金黄发亮，仔细辨认，竟是黄金！这便是本地盛传的"金牛过河"的故事。

金牛过河以后又到哪里去了呢？原来到南岸"放牛坪"去了。"放牛坪"有一户农民，母子二人，相依为命。儿子为财主放牛，每天天刚朦朦亮，便来到牛圈，把牛牵到对面草坪吃草，夜暮方归。那里人烟很少，四面全系树林，有一天，忽然来了一个中年汉子，牵了一头黄牛来此放牧。因为地点偏僻，以往只有一人放牛吃草，现在又来一人，日子稍久，两人熟悉了，不免闲谈起来。

放牛的青年述说他父亲原系这家财主的佃户，五年前病死，家里还有一个年老的母亲，全靠自己帮财主家放牛供养，可是从早到晚，忙碌一年，挣的工钱很少，难以维持一日三餐，他只好以粮食奉母，自己则待母亲吃过饭后，煮野菜充饥。中年人听了，很表同情，见这青年一边放牛，一边采集野

菜，便安慰他不必忧虑，自己可以帮助他解决每日柴薪所需。他说这条黄牛拉的粪，还晒干贮存着，正好可作柴禾。到了傍晚，青年把牛牵回东家牛圈后，便回家挑了担子，来到草坪上，跟随那中年人来到一处石崖之下，那里有一个洞穴，门口果然堆放了不少干牛粪。中年人一面把黄牛牵入洞内，一面吩咐他尽量多搬些回去。可是这青年并不贪多，随便撮了两大块，挑回家里，待仔细一看，哪里是什么干牛粪，竟是两大堆黄金。母子两人，高兴已极，再去寻那洞穴，已找不到了。此后再也不见那中年人来放牛。而那草坪由此便有"放牛坪"的名称了。

重庆的天财地宝，并不止一处；金紫门不过是其中一说，还有一个关于"金鸭"的故事。重庆陕西路下段，挨近过街楼，有一条巷子，名叫"金鸭巷"，是一处小巷道，巷内全系住家院落，金鸭便藏在那里。它深匿在砖墙内面，或伏居地下，勿论谁行经巷中，只要鼓掌，或张口长啸，那隐藏着的金鸭便会受惊回应，高叫起来；如停止呼叫拍掌，鸭声也就停止。因此许多好奇的人，常去巷内，故意喊叫拍手，以逗引金鸭为乐。尤其是一般孩子，更喜欢到那里去逗耍。只是金鸭是何模样，究竟藏在什么位置，则无人见过，也无人知悉。"金鸭巷"却由此得名。

这事给一个外国人知道了。他不知用什么方法，把金鸭藏匿的位置探查了出来，之后勾结地方豪绅，买通官府，竟把金鸭盗走，弄到外国去了。从此以后，无论怎样鼓掌呼叫，便再也听不到金鸭的回声了。

1947.5.10—19《重庆夜报》

东华观的由来[①]

儒、释、道三大宗教，在清代巴渝各有本堂，除夫子池的文庙（儒），西里的华岩寺（释）而外，东华观便是道教玄门所归。东华观地址在城内四牌坊中段，范围很大，左起文华街，右迄玉带街，后面则以现在的大梁子[②]南隅三、四牌坊[③]为屏。这里原系一带高崖，形势险峻，下有十八洞，大小虽不一样，深浅各不相同，怪石嶙峋，藤葛满布，每到盛夏，凉爽异常，本地仕商，常在这里宴会；私家富户，前来避暑的就更多了。

东华观与南岸老君洞，江北弋阳观，同为道教本堂，分据渝北南三岸，成鼎足之势，但以东华观为最大，尤如释家的丛林。相传极盛时代，各方来此驻锡留参的道士，几乎有千人之多；观址殿堂观舍之外，后院花园，及东华十八洞，尚属客区游地。园门外面有小街三条，两列店家，都以制做出售道士戴用的软硬冠帽为业，直通较场演武厅，故名为“道冠井”，至今犹存，由此可见当年盛况。

有一种传说，东华观原名东华寺，乃明朝巴渝古刹之一，

本属释家所有，到了清朝，才为道人鲁一冲施法斗讼，改为道观。名称上只改了一个字，却有很大分别。但是观内仍有遗迹可寻，如正殿老君三清神龛，竟系盘坐莲台，而不是各跨青牛、狮、貔，这便是已往东华寺原有三尊佛像，因施术不及之故。至于道人鲁一冲斗讼，乃全因玄门在渝城缺乏本堂，虽南岸江北已有所据，但府制城区，不能或缺，其作用颇有与儒释两教非成鼎足之势不可。

鲁一冲于乾隆中季，由小河嘉陵江上游而来，是在华蓥山修炼的；亦有说自青城而来，于朝拜华蓥之后，顺江而下，特来渝城开创观基。他的外表，完全是一个游方道士模样。传说他最初从合川乘船南下，于磁器口上董家溪，便收伏了“飞缆子”(即今飞缆子滩)这一大精怪，第一次在巴渝显示道术。然后将“飞缆子”埋压在第一山长安寺韦陀座下深井中，并在南岸真武山山顶,竖立了一根铁桅杆,以为镇慑(铁桅杆至今尚在，一般呼为铁树),还在千厮门城墙边建了个“鸡毛土地”,相距不远,又在崖石上刻有“飞缆子”石像，这些都是他的遗迹。

鲁一冲在重庆的遗迹很多,四方街与一牌坊之间的“神仙口”,也是因他曾在该处显示法术而出名，且其事正与东华寺更名有关。原来鲁一冲到重庆之后，终日游荡于市，目的却在寻找适当的地址，以便开辟玄门的堂基。他每天就在东华寺山门口月台坝上卧宿。这里本是僧庙，小沙弥见有游方道士憩睡山门，竟加歧视，多次干涉，不准居留；鲁一冲置之不理，也不移往别处。后来寺内当家和尚，听信沙弥谗言，

竟用馏水洒泼，驱逐鲁一冲。这便导致东华寺被改作道观。此事发生后没有几天，在文华街一带，有道士高呼“卖雷”，人们以为游方野道，妖言惑众，不予理睬。过了数日，一天中午，却有个无知小孩，好奇心动，不知雷为何物，将所得买糖果的一文钱，向道人买一个“雷”。道人将小孩左掌画符令一道，命其紧握返家，方能开视。小孩行走间，正值巴县正堂何宗儒出衙，前队道锣响亮，小孩失惊不禁伸开手掌，只听轰然一声，惊雷震响，何知县立即下令追究，从小孩口中问出系道士所为，立即带返衙门询问。

这道士不是别人，正是鲁一冲。他供称东华观被和尚占据，改名东华寺，以致无所栖止，只得流落街头募化，恳求县大老爷作主。何宗儒信以为真，即出签饬差，将东华寺当家和尚拘到，当堂鞫审。和尚说，寺基乃前辈大和尚递传而来，根本不是占据玄门道观。双方各执一词，势不相让，无从判决。

何宗儒知县根据鲁一冲请求，次日到东华寺实地查勘，以明真象。和尚返寺后因日期迫促，只有一晚，连夜布置，整顿一新。次日知县率领仪仗差队前来，带同原被两告，入寺逐次勘视各处，所有一切，均系佛寺布置，惟大雄宝殿佛像三尊，竟已变为老子一气化三清，座下则为莲台，而非青牛、狮、貔，据说这便是鲁一冲使的“法术”。鲁一冲即据此禀称为道观铁证，并指控和尚来不及更换完善的地方。

东华寺僧，仅因此一点败讼，改寺为观，由释而道。东华观自此陆续扩大规模，修饰环境，成为玄门宗堂，山城避

暑胜地。至于三清莲台座，则仍按原样，并不改换，以志胜迹。

1947.6.14《重庆夜报》

注：

①本篇原题名为“东华十八洞”。
②大梁子——今新华路。
③四牌坊——在储奇门与太平门之间。

神仙口的传说①

渝市旧有街道，名神仙口者，在今林森路中段，与四方街相连接，右近四、三牌坊，后向文华街，直上即达中华路口；此处为三岔交汇，通衢要道，范围虽小，而街名甚著，即今另标新号，早经更异路名，倘一提及“神仙口”所在，莫不立指为某处也。

神仙口之名特彰，因其所在，乃渝城盛传逸事多端，妇孺均已悉闻，惟多里巷散谈，属于无稽。最堪笑者为“神仙口”，系“神仙狗”之误。相传昔有乞丐，卧倒该处，殊不明其从何而来。丐为一中年黑须之病人，左腿有脓疮，累累腐肉，淋淋血污，似已不能起行，倒卧历数日未去，既不向人求乞，惟长呼往来行人：“谁发慈悲善心，为我用舌吮舔疮口，则可就痊愈，功德无量。”终朝求告，见者尽皆深恶其秽，掩鼻合口急避之，连日不得人近视。

后忽有野犬，竟能不厌其恶，趋而为其吮舔血污。丐欣然起立，手抚犬头，频频称善，即偕升空，冉冉隐入云际，众始知实为仙人度市而来，殊无识之者，特此命名，提此为

街称也。

此一传说，非特无稽，乃属虚构讹拟，信口之言。实则神仙口之得名，本系风云怪异，确有奇迹发生于此。大凡地方故老，尚能道之。神仙者，指开辟三牌坊东华观、巴渝玄宗之鲁一冲也。时在清代中叶，鲁一冲既来渝城，即兴东华观之讼，与原来寺中僧侣，互争其基，常浪游市街，因讼尚未直，仍属游方羽士之流。

当其浪游之时，竟显示神通，冀令官衙受理诉讼，使出"卖雷惊官之术"(见《东华观的由来》)，东华观自此始入衙名。

卖雷震彻之处，即文华街下转岔之口。此地本无街称，但异事已传遍遐迩，后因留记奇迹，兼以示崇仰鲁一冲之玄妙，遂以"神仙口"为名了。

"神仙口"原名"鱼市口"，此非专有定名，是一般人口头习惯，就其实际情况而称呼。此处本为下城菜市之一，同上城之大阳沟，中城之小什字（亦名菜什字)，乃菜贩所集。菜市占地颇长，连带太平门、四方街，均在范围之内。

菜市内容，原按种类分别，荟集一处。近巴县衙门口一带，为南货摊店及猪羊牛肉架所在，居中之四方街，则为菜蔬一类，至于鱼鳖水族，则在文华街下口，街之两旁，全为摊贩盆钵罗列殆尽，"鱼市口"之名，遂由一般人习呼而成。

此处与巴县衙门相距不远，清代，冬至后期，处决人犯，即以该地为法场，免在辕门月台，又较近便，监斩守护，两得其利，及后竟成正式刑场，即以地当冲要，决囚于此，

寓与市共弃之意。清末宣统年间，平时重案立即处死，亦皆绑赶至此，直至民国成立，刑犯始另移别地。

“鱼市口”因作为刑场之故，遂不免有种种传说，但均为市井俚谈，类属无稽，或由偶然误会，而颇资发噱者，既有其言，不妨记之。

某次秋决，是日共斩囚犯十人之多，此在清朝却非常案，极为鲜有之事，先期已轰动全邑，致到日临场观看者，拥挤异常。旧例，因脑后蓄有发辫，待决之犯，于提堂撕衣上绑时，必将发辫由解差代为挽成一结，盘于头顶，颇似道士之顶结。

囚犯押至刑场，尚须用套勾长竿系其发结上提，俾引其颈伸直，以便刽子手奏刀。那知这一次，十囚斩首后，监斩者清点首级，竟得十一颗头，而身躯则仍十具摆列场次。初颇大惑，不明何以致此，后加以详查，始知刑场之旁，有一理发棚，当囚犯押至，一客正就坐理发，剃师正为之挽辫于顶成结，复又折转衣领，露出颈项，以便就洗，此客亦欲观望热闹，由棚内窗侧长伸颈项而出，适与列跪囚犯相距甚近；刽子手挨次奏刀，一一顺序而劈，至最末，尚有一人，与待决之囚，约略相似，未加细辨，亦未计算已斩人数，即引刀一挥而下，遂成此大错。

渝城之有电灯，始于一九一〇年“烛川电灯公司”成立以后，地址在太平门人和湾，除私家安装外，乃有街灯照明。在前则每至天晚，仅繁盛市街两列行号店铺门外，各悬四方或圆形招牌油灯一只，蓄油不多，二更左右，即告熄

灭，全街遂入一片黑暗。

至于小街僻径，大都是院落住宅，傍晚不久，即严扃门户，反无一丝光影，偶有热心公益者，照明一、二，指点街巷，亦属纸糊木框，机心萤火，行人略可辨清途径，至夜不过更后，俱告熄灭。除此之外，则有深夜售卖零食之小贩，挑担顶盘，走街穿巷，皆自备铁皮油壶，光亮较明。

“鱼市口”虽当通衢，复接闹市，但夜间亦仅有店铺号灯而已，即以地为刑场之故。每至更后，遂少行人，胆怯者，更不敢途经该处，是以冷落犹较其它街道为早。然而交通必由，仍有深夜来往于此者，究觉黑暗阴沉，凶戾尚在，倘非无所忌惧，方自泰然，否则心理虚慑，四顾茫然，终难免于即景生念，引发恐怖。

胆怯迷信之辈，每有忆测揣想之谈，指鱼市口杀气太重，邪地生异，以讹传讹，遂致越觉阴森。除白日开市，行人繁多，不虞意外，每至夜间，即成险境，皆要视为畏途，积久言传，竟有鬼叫怪号之闻，正头血颈之见者，杯弓蛇影，愈启异虑，无中生有之说，反引适逢凑巧之误。

有挑担售卖油余灰水粑者，夜过鱼市口，方停步歇肩，叫喊招徕，忽有人自黑处走近，未及走拢，先道“借光一用”！担上有油壶一盏照明，挑担者问：“借光何为？”答曰：“脑壳失落，寻找不得！”语方出口，挑担者抛下担子不顾，急奔逃跑。

须臾，偶有行人过此，见一黑影，手提粒火油壶，躬身街侧，蠕蠕而步，异之，问：“何所为？”则闻漫声回答：“我在寻

找失落的脑壳。"问者不俟细辨，闻语反奔几仆，惊吓至于不能出声。

久之，卖灰水粑者，未能舍其靠以维生之挑担，放胆蹑返，遥见一人，正将油壶还插担架之上，且自取锅内灰水粑而食，详审之，确为人也。及走近诘其究竟，始知适才所谓“脑壳”，乃叶子烟管铜斗，俗叫烟杆脑壳，坠落于侧，借油壶照寻也。

1947.12.29—1948.1.4《重庆夜报》

注：

①此篇原题目为《关于神仙口》。

文峰塔由来

过去科举时代，各地对于文风的注重，是比任何事情都认真的，似乎本地方的上下人群尊荣显达，皆系于文风的盛衰。有的甚至为着竞争甲弟，不惜互相攻讦诽谤，如苏浙两省，互相编造出“白蛇传”、“玉蜻蜓”的传奇故事来，藉以讽刺，便是一例。

重庆为四川首府，号称山明水秀，人文鼎盛之区。一个特殊人物的产生，总不免认为是地灵人杰之故，因此，风水的讲究，不仅民间崇信，地方官府，也负有特别的责任。

据说渝城早年官家叠出，甲不绝科弟，乃是山形地利配合适宜，天然形势所使。如大河正面南岸屏山列堡，是“凤凰展翅”的状态，涂山为体，左右伸出二翼，远看一目了然；长江为玉带环腰；再有玄坛庙“字水”旁边的青狮，朝天门右上的白象，配合真武山下的“鱼跳龙门”……所以功名绵延，盛况荣显，超越其它各处。

清代嘉庆年间，一连三载，渝城竟无人名魁金榜。这不仅是地方之耻，本地官府，也连带的光彩消失，可以蒙上教

说无方，循文无知的罪名。这样重大的关系。地方绅首士庶，以及府道县厅（江北厅），当然不敢忽视，便积极研究原因，考究内情，煞费周章，几经月日，方发现地方科考不兴，庙堂钟鼓不鸣者，乃“风水”之故也。

考究结果，认为是“风水龙脉”的关系。以前每年正月元旦，到南岸真武山赴香会的人们，由半山回龙桥直上南天门，而达山顶真武庙，这是唯一的道路。后来一位川东道台，据说为了还香愿布施功德，特地由回龙桥另修一条石板大道，直达山顶，从此便有了老路新路的区分。实际上对于行人，这两条路长短一样，仅仅新路略为平坦，交通往来，也没有多少便利不同。然而这一条新路，可把本地的“风水”破坏了，因为正好压断“风凰”的左翼。

为了弥补颓势，挽救文风，才想出了一个办法，特地在南山巅上，修建七层高塔一座。早年城内东水门禹王庙侧，也有一座七层巨塔，上供魁星像，相传川东文宗，所寄于此。

自从南山顶上的高塔落成后，从此每天正午，日到中天便可瞧见南北二塔的倒影，映照到长江中；两个塔尖，却恰好结合一起，再不象以往的空着一线缺缝了。这样，据说不但有补于“龙门”，有繁于“龙脉”，更还接续了气势，挽救了“风水”，因此，便命名为“文峰塔”了。

重庆南岸，原有二塔。一为龙门浩上的觉林寺塔；还有一座，却是用鹅卵石垒砌而成，高不过三尺，用泥浆糊砌在龙门浩河岸石梁上。这一座小塔，相传自清代开国，便已发现·不知何时何人，为何而造。据勘舆者观察，也是适应配合“风

水”而作，并非偶然造就。历年夏季，长江水涨，南岸傍河一带石梁，都遭淹没，那一座小塔，也同时沉入河内；可是到了秋末水退，石梁出现，小塔依然完好，又露了出来，经历多载，都是这样。自从文峰塔修成，南岸有了三塔，但是各处地势，互不相照，便流行“三塔不见面”的说法，就是指的这几处胜迹的状况。

1948.1.7—9《重庆夜报》

涂山氏故居

据经载："禹娶于涂山氏，出治水，三过其门而不入。"这是人们都知道的。至于涂山氏何许人也，故居哪里，却人言各异。关于涂山氏的出处，现今共有三处，谁都有遗迹可考。其一为河南省之涂山，其次山东境内也有三座涂山，此外在四川重庆的对河南岸亦有涂山。三处的人各执一词，认为真正的涂山氏故居，乃是本地，其他皆伪也。

倘若依据遗址古迹考究起来，在重庆对河南岸的一处，才是真正的涂山氏故居。这不是各本成见，历史故事，早经时迁境易，全仗现有的实际证据，为追溯的凭依。河南境内之涂山，仅一山堡而已，上面可资考究的，有涂山氏与夏禹的神祠一座，别无他迹；山东省的涂山，在泰山附近，也是一座小丘，除一碑记而外，神祠庙宇俱无。重庆的南岸之涂山，又名真武山。因为山上有真武庙，所供神像，以降魔辖怪的真武祖师为主，据说夏禹治水有功，即成为真武祖师，以镇压山灵诸般邪异为法力，其实此山即真正涂山氏的故居。山右石崖壁上有绝大"涂山"二字，为小扫把陈竹波所

书并亲自镌成，饰以白灰，每年由真武庙住持粉刷一次，直至于今。

现在所以稽考的遗迹，首为真武庙内之“禹碑”，真武祖师在大山门的首殿，禹碑就在殿里，高丈许，石质淡黑。上面所有镌刻文字，虽然大多数尚属完好，但系古篆，却又不墨规有本的篆法，似蝌蚪而非蝌蚪，似蚓文而非蚓文，那种古书法不容易认出来。过去曾经有不少专家，前去涉下以便研究，终未获得结果。十余年前，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旅行至此，也曾特地招工摄取副页甚多，以便携回考究，仍未听得公布下落；仅后来报上揭载该院已考出此碑确系上古遗留之物，但文字则不能注释。

其次则为半山回龙桥下，深测西崖石崖上的刻字。这里是两山并峙，深数十丈，东面为登山的大道，可以影见江面的石崖为一高达数十丈的陡壁，岩天雄峻，刻字为一横额式，宽十丈开外，高达丈许，曰“涂山”。笔色苍劲，作正楷，一米可见，但未附年代书者名氏。早年曾由山上真武庙住持，涂以珠红颜色，俾岁首元旦，香会期间，可以引人触景生情，今则早已置之不理了。

这一石刻，据考究起来，也非数百年也。刻得虽然字迹伟大，但以琢取不易，且面积过大，故尚无人前往制作副本。至于原有的《巴县图志》，在民国十五年巴县文献委员会所重修的《巴县志》上（新志，计共廿本，附有图考），均无记载。

除掉以上两大遗迹更有“呱呱而泣”碑记，在山上真武

庙侧，由山门右下数十步塑立道旁。碑高约一丈，乃记夏禹出治水，三过其门而不入，涂山氏已经生子，抱着婴儿，立此瞻望父归夫还，儿呱呱，涂啜泣，想见当时凄切的情景。这一碑记，也是为涂山氏故居之一强证。

距离真武山十里，正当大河南岸弹子石码头与野猫溪江畔之间，有石梁由水内凸起，江水至此，积成浅滩，以春夏之交，洪水泛涨，正将石梁淹没时为最险，行船不慎，每致覆沉。此处地名“呼归石”，又称“夫归石”，相传亦系涂山氏遗迹。因夏禹远出治水，涂山氏常抱着她的婴儿，到此立于石上，遥望呼归，因而得名。

还有人说“呼归石”乃“五贯石”之误，系古时窦燕山居此，因所生五子都获高中，联芳吉弟，后人为着纪念他的教子有道起见，故取此名。又作“五贯石”，寓五子攀丹折桂之意，这一种说法，尚无考究。

1949年3月2—3日《重庆夜报》

九　龙　滩

渝城大河上游十五里，有码头名“九龙铺”。抗战时期，开辟公路，并设过江车渡，随即又建设机场，交通日益方便，人口相应增加，商市热闹，茶馆酒店俱全，往昔亦有百十户人家，但不如现在这么繁盛。

“九龙铺”乃“九龙坡”的讹呼。起因于市集傍山面水，靠西与浮图关、马王场相通，山路交错，非铺而为坡。其实详究来由，九龙坡又因九龙滩而得名。九龙滩在靠河岸处，滩虽不大，水流异常湍急，因这里适当河曲，上承李家沱的来势，下值鹤皋岩的弯拐，遂成急滩，泡旋起伏，水花飞溅，远近十里以内，都可瞧见白浪滔滔。

“九龙滩”原本没有名称，其起源在三百余年前，即十六世纪末叶。其时正当明代万历年间，渝北南三岸，各有执事，分别管理，不过都属于重庆府所辖。南岸亦称南城，范围较江北岸小，地点在海棠溪与铜元局之间，即所谓南城坪（现呼为“南坪”）；坪基甚高，为一天然城址，四面修有围垣雉堞；直到清人入关，占据中原，改变地舆制度，始废除南城，

拆去垣垛，所有东南两里，全部划入巴县辖区。至今南城坪尚可寻见旧时城垣遗基。

相传南城县宰刘永煌，为江西吉安府庐陵县十六都人氏，崇敬佛道，迷信勘舆，任职数载，甚得民心。一天，忽然梦见奇异，觉自身正在衙门内堂的高阁上闲观瞭望，猛然瞧见由南门飞入红龙，共为九条，穿城而过，由东门飞出；南城坪仅有两门，东门外即近江岸，正与渝城南纪门对峙，为两地往来的水道要冲。刘知县大为骇怪，一惊而醒，心里颇感疑惑。此时天已近晓，窗外显鱼肚白色，他在床上辗转思忖，忽闻外面有锣鼓声传了进来，知系丧家抬灵送葬，不觉心里一动，便起身到高阁上去观看。

此阁甚高，又居城中心，站在其上，城外四周的景况，一览无余。刘知县看见正有一起送葬行列，由南门进来，经过市街，直向东门出去，灵柩后面，跟着披麻带孝的孝子，共计大小九人，自成一线，旗锣开道，吹打不停。

刘知县看了这情形，猛然想起夜间梦见的奇象，相互印证，不由心中更感诧异，立即私遣差役，随后跟着这一起送葬的，且看究竟如何，去到何处？不久，差役回报，九个孝子把灵柩送到河下，上船划向对岸浅滩前，候到辰刻时分，便共同抬起棺材，抛下水中去了，此外没见什么特殊现象。

原来死者亦谙熟勘舆之术。他竟然发现一路“龙脉风水”，集中南城斜对岸的浅滩，倘能葬于此地，可以获致九代帝王的幸运。可巧他正有九个儿子，便嘱咐九子于他死后，将灵柩用船运往滩上，等到辰刻，便有水花冲起，立即亲手抬起

棺材抛放水中，自会涌起河沙，将灵柩掩埋。九子谨遵父命，待其死后如法办理，却不料给当地县宰刘永煌知悉，据报之后，明白此中必定有特殊缘故，即亲自暗中前往视察。他也深研勘舆，精于此道，察看之后，心中便明瞭原来如此。

过去君主时代，地方官吏认为此类事件属于谋逆反叛，遂派差将九子捕杀，并抄斩满门；至于那幅阴地，则派石工断水埋炸，予以破坏，使“龙脉”中断。但此一段故事，已经传遍远近，于是这里遂起名为“九龙滩”，更由此滩而连带呼岸上的小村为“九龙坡”。

1947.5.3.《重庆晚报》

江北烈女亭

江北问津门外，靠左的城垣下，是一带石崖，高约数十丈，葛藤长垂，野树丛生。石崖下面，大江滚滚，凸起一带石梁。每当仲夏，两江泛涨，河水直达崖下，石梁成为一处凶滩。河下的人，根据石梁的形状，便将此处取名为“虾蟆口”。

洪水期间，江面宽阔，河水泛过石梁，虾蟆口亦被淹没。江水在石崖下形成漩水，俗称“回水沱”，所有两江上游漂浮来的东西，有一部分便顺流冲入沱内，旋转浮沉。因此，这里历来设有红船救生，善堂施有棺板，以收殓掩埋打捞起来的浮尸。

问津门前，有石级数百步，沿石崖凿成。在石级的中段，路旁有一座亭子，傍城墙而建。这是一座长方形的建筑，临江的一面，是一排漆成红色的百叶窗。亭子的屋顶，接近城墙的雉堞，在清朝后期，这座亭子一度是很辉煌清洁的。江巴两县的士绅，有集会应酬，常在此亭中举行，成为江北城人们避暑纳凉、观赏江景的一处胜地。近几十年来，

不再进行维修，任其风雨侵蚀，亭子早已败坏堙没，仅存危柱残瓦，一片荒凉。

故事发生在清朝同治年间。嘉陵江上游的合州（现在的合川县），有处水码头叫“小沔溪”，距县城五十余里。这是渠河下游的一处热闹码头，凡是渠县、广安等地来往重庆、合州的船只，都要在此停靠；达县等地山区走川东的商贩，也在此打尖歇足。此处又是渠河岸米粮集散之地，故店铺较多，颇为出名。

码头上店铺林立，形成街道。其中有一家客店，叫“戴家老店”，主人系本地土著，世代居住于此，经营旅栈已有多年，来往的商贩都很熟知，行人至此，遥见檐下高悬写有“未晚先投二十八，鸡鸣早看三十三”的白纸号灯，便知道是戴家鸡毛老店。

店主戴掌柜已过中年，妻子早亡，膝下只有两个女儿，年已十五六岁。这两个女孩自幼聪慧勤劳，性格幽静拘谨，尤其善于针凿刺绣，店中的缝补浆洗，全靠这姊妹二人料理。左邻右舍，尽皆羡慕戴掌柜有这一对勤快伶俐的女儿，亲戚朋友，无不夸奖这姊妹二人的能干贤淑。老父怜悯她们母亲早逝，膝下又无兄弟，不愿将女儿早嫁。虽说媒者纷纷登门，戴掌柜总觉不甚合意，故二女尚未字人。

戴家老店开业多年，久著信誉。戴掌柜为人忠厚诚笃，善于经营，小有积蓄。亲戚中有人见戴掌柜中年丧妻，尚未续娶，持家无人，便劝他续弦。戴掌柜对亡妻感情深厚，女儿又未出嫁，不愿续娶，但经不住亲友们一再劝说，后来便同

意了。

续娶的妇人姓江，因为生性刻薄，不敬公婆，被前夫休回娘家（封建时代，男尊女卑，丈夫认为妻子不贤，便以"休书"将女子退回娘家，尤如今日之离婚，但那时休退纯以男方意见为主）。这位江氏认为两个女儿系前妻所生，十分嫉恨，处处挑剔，经常借故无端责骂。姊妹俩自怨生母早死，活该命苦，虽然后母百般凌虐，仍是逆来顺受，含苦忍悲，更不敢向父亲诉说，只有在夜深人静，相抱而哭，自怨自艾而已。

戴掌柜虽也看到一些情形，但却无可奈何，唯一的办法，就是为二女早日择配。但江氏却以种种藉口，一再阻挠，并且终日在枕边向戴掌柜诉说二女对她不敬，极力搬弄是非。戴掌柜最初虽不以为然，但经不住江氏利口，枕边热话，日子一久，也就逐渐信以为真，父女感情，也逐渐淡薄起来。

旧时小家姑娘，极少读书识字的。戴氏姊妹，勤习女工，操作家务，虽然幼失怙恃，但从小思想纯朴、品行端庄，未致稍有失格。江氏对二女百般凌虐，仍嫌不够，尤其是二女逆来顺受，极力忍耐，更使她心头怀恨，欲置之死地而后快，势非拔掉这两颗眼中钉不可。便想了一条恶计，从中进谗，横加诬陷。

戴掌柜打算为两个女儿择婿，江氏便说，这两个女儿早就有失德的行为，出嫁后戴家要蒙受奇耻大羞。戴掌柜最初不信，但江氏成天絮絮叨叨，捏造事实，诬陷诽谤，久之，戴

掌柜也就信以为真，认为二女有失门风，不再考虑其终身大事了。

戴家经营旅店多年，小有积蓄，自然引起盗贼留意。一天夜晚，月黑风高，一个强盗翻墙进店，直入内室，正经过两女寝房门前，忽然店中的伙计惊觉，大声吆喝，群起追捉，强盗慌忙爬上二女闺房的屋顶，跳墙而逃。江氏便向戴掌柜进谗，说晚上进来的，并非强盗，是两人不贞，深夜幽会，故来人是从二女闺房屋顶逃走。戴老板信以为然，便令两女跪于堂屋前，严加鞭挞，江氏则在一旁数落辱骂。两姊妹遭此无端冤枉，有口难辩，羞忿难忍。二人回到室内，呼喊自己的生母，相抱痛哭。

两姊妹相抱痛哭了一整天，无人递茶送饭，父亲听信后母谗言，怒气未消。两女知道生机已绝，倘若苟延残喘，后母必然加倍凌辱，岁月茫茫，今后的日子更不堪设想，不如追随亡母于地下，用死来表明自己的清白无辜。

两女未读书，决心一死，自然无法留下遗书以明冤屈。次日夜晚，深宵人静，四野茫茫，风声萧萧，两姊妹来到江岸，解下脚带，合抱大石，互相捆住，紧紧拥抱，对着苍穹，低声叫道："妈妈呀，女儿为您作伴来了！"说毕，跃入渠江。

其时正当洪水季节，渠江猛涨，在合川与嘉陵江相汇，浩浩荡荡，流入长江。此刻，江北问津门外虾蟆口的红船，昼夜巡逻，打捞流入沱内的什物。船上的人，忽见浮尸两具，紧靠一起，由汇川门方向往虾蟆口沱内漂来，便划船过去

打捞。捞起一看，竟是两具女尸，合抱一块巨石，布带紧束腰身，互相拴在一起。虽已早死，但面目尚好，衣着完备，不象被人推入江中，更不象失足溺水者。搜寻衣袋，也无遗书，无从查明姓氏里居，便暂时停放三洞桥桥下，以待次日用棺木收殓埋葬。

当时任江北理民府的保芝舫，则从所属乡镇视察粮情稼况返回府衙，由溉澜溪登船回江北，船在问津门靠岸后，改乘大轿进城。仪仗前呼后拥，轿班拾级而上。保芝舫坐在轿内，遥见桥下围了一大堆人，便令差人前往察看。回报是二具女尸，由上游漂来，无姓氏里居可稽。保芝舫便命停轿，饬保正前来询问，得悉情况后，认为其中定有缘由，便吩咐暂时棺殓，但不忙下葬，就地停厝在码头上，以待亲属认领。

随后，理民府又发出告示，详细列明二女面目特征，衣服穿著，遍贴江巴二县，两江上游，沿河场镇。先后过了三个月，仍不见有人前来认领。

匆匆过了半年，大家对此事也逐渐淡忘了。哪知有一天，来了一个老者直赴江北衙门，自称姓戴，系由合州小沔溪前来投认二女尸者。

原来二女失踪后，其父戴掌柜激于情感，打算寻找。哪知江氏又趁机进谗，说二女因私情泄露，无法再事隐瞒，干脆不顾羞耻，随着相好的男子私奔了。戴掌柜也认为是这么一回事，必系私奔无疑，也就无心找寻二女下落了。转瞬过了数月，听见不少过路人谈论江北理民府的告示，不觉引起猜测，出于良知，才起程来渝。

保芝舫讯明来由，当即饬派差人带领戴掌柜到停厝的地方，启棺察看。时隔半年，尸体仍然完好未坏，面目如生。戴掌柜见了，悲恸万分，方才觉悟后妇的诬告陷害，而自己误信奸言，以致亲生骨肉含冤受屈，溺水惨死！但大错业已铸成，悔之已晚，沉痛之极，便具禀事情发生的前后经过，痛斥自己的过失。

江北城乡人士至此方明白二女自溺的根由，对这两姊妹的贞烈十分赞佩，主张建祠立祀，给予表彰，以慰芳魂。保芝舫深表赞同，传谕街坊绅士，共同集资，就在虾蟆口石崖处，兴工建筑一座长方形亭舍，设立龛座，上供二女牌位，供人们凭吊，永享香烟，并亲自题写“烈女亭”扁额一块，高挂亭上。

戴掌柜遭受这一沉痛打击，伤心已极，特地购置上好棺椁，亲自护送，将两女遗体迁葬于三洞桥旁青草坝之阳。并等烈女亭修建竣工，目睹香火不绝，才返回合州。此时他已心灰意冷，对江氏非常憎恨，便择期召请亲友族人，并江氏娘家父母兄弟，详细述说二女致死经过，立具休书一封，当众交江氏父母。随即变卖所有产业，将全部资财，分赠贫苦亲友和乡里。然后又乘船东下，再次来到江北，延请江北城隍庙的和尚，就在烈女亭神龛牌位前，给他摩顶下发，剃度出家，以示决心忏悔。据说剃度后他乘船西上，前往嘉定，不知所终。

1947.10.15—21重庆夜报《重庆杂志》

总　土　地

中华路南段，又名杨柳街。传说是明末张献忠率部入川，山城遭受兵燹，张路遇一妇女偕母携子逃难，感其孝心，嘱回家挂杨柳于门前，可保无虞。妇女返家后，告左邻右舍，于是都效法置杨柳于门前，一条街得以保全，后来便名“杨柳街”。抗战期间，杨柳街拓宽为公路，改名为“中华路”。

杨柳街中段，有一处小巷子，名叫“总土地”，巷中有一个土地祠。关于名称由来，有一段故事，且近乎神话。

原来，杨柳街有一户姓樊的人家，颇为富裕，正室之外，娶有一位姨太太。这年夏天，樊姨太太与几位亲友的太太小姐一道，在附近的东华观游乐宴会了一整天，返回时已是傍晚时分。她感到玩得有些疲倦了，便吩咐仆佣备水洗澡，顺手将头上的簪子、腕上的金镯取下，放于床头，随即解去衣裙，进卧室侧边一间屋去沐浴；并叫婢女映红进来侍候，给她擦背。

洗浴完毕，樊姨太太回到卧室，穿戴停当，便将适才放在床头的簪子金镯收拾进首饰箱内，哪知一清点，其它首饰均在，惟独少了一件金托针。这件托针，虽然不算顶值钱，

却是老爷去年上省的时候，在成都订制给她带回的纪念品。她在床头和踏板上寻了一遍，不见下落，只是洗澡这一会儿，肯定是被人偷去了。想到刚才取下饰物时，只有婢女一人留在屋内，便认定是映红所偷，喝令跪下认错，要她立即交出所偷的托针。

映红本是壁山县一户农家的孩子，不过十二三岁，因家庭贫寒，她的父母便拜托一个在重庆帮佣的本乡人，带到重庆，送给樊家当一名使女。樊姨太太见这孩子生得伶俐，便留在身边做为婢女，并取了个文雅吉利的名字，叫映红，至于她姓什么，谁也不知道了。映红跪在地上，声称没有看见什么金托针，更没有偷拿，樊姨太太哪里肯信，一阵鞭笞，映红只是啼哭求饶，不承认自己偷了托针。樊姨太太越更生气，口里说着："这屋里只有你一个人，没有别人进来过，不是你偷了还有谁？今天要不认，非打死你这贱骨头不可。"说罢，劈头盖脸，又是一阵鞭子，只打得映红脸上、手上青一块，红一块，啼哭求饶；但还是不承认偷了东西。这时佣人请樊姨太太吃夜饭，她方才暂时罢手，喝令映红跪在屋里。樊姨太太把映红打得这般样子，怒犹未消，非要拷打出口供，交出赃物不可，否则还要从重处责。映红也知道还有许多痛苦要领受的，感到畏惧，便于当天夜晚，乘人不注意，私自逃出；但又没有去处，便奔到附近巷内的土地庙中躲藏起来；因为这里既隐蔽，又黑暗，小孩子的心思，以为这是一个安全所在。

在夜深人静之后，大约深夜十一、二点钟，映红于睡梦

迷朦中，忽然被一阵声响惊觉了。她伏在土地庙角落里偷眼瞧看，只见有不少人在庙里集聚，都是衣冠整齐，面相和善的老头，分列在正中左右，好似在夹道等待欢迎谁。上首设着公案，似乎有人在案后高坐，穿着得十分豪华阔气，真是披金戴银一般，所有的人都挨次向他讲什么，似乎在禀报，但声音很低，听不清晰。后来，近处一人，拱手发言，映红因相距不远，较能听清。只见这人说："本坊杨柳街樊宅，其妾昨日就浴，放置外间的赤金托针一只，被老鼠含走，拖到房内右壁箱架下面，竟诬婢女映红所偷，毒打过甚，此事……"映红听了这些话，更是吃惊，但却没有主意，不知如何是好。不久，又见所有人等，好象报事已毕，陆续退出庙去，一会天色便已大亮。忽闻一片人声嘈喳，原来昨夜映红逃走，后来樊宅便发觉了，派人各处寻找，此时寻到土地庙内，将映红寻到，立即扭回。

主人认为映红是畏罪逃跑，正准备狠狠毒打，映红惊骇万状，便说出昨夜在土地庙内所见所闻。最初，主人还不敢相信，随意用眼向右壁箱架下忖视，竟发现失去的赤金托针，果然在那里，这一下才证明了映红的冤枉，同时也感到这座土地神的"灵应"。这件事一传开，本地的士绅商家，便悟到这一处的土地，必定是重庆城内矮神之首，于是倡议捐款扩大庙基，并称这座土地庙为"总土地"，这一条巷道，也由此得名。

1947.6.19—20《重庆夜报》

较场坝土地

关于"较场坝的土地"一词，乃重庆流行的一句歇后语，意即"管得宽"的意思。但要详细解释起来，则不是三言两语谈得完的，其中更与地方习俗，过去的制度相联，但就此一语，已可见过去的民风之一般了。

中国长期封建落后，崇信神教。人们大多相信天堂地狱，赏善罚恶，笃信阴阳勘舆，认为"阴间与阳间是一般"，一个人始终是逃不出世界幽冥这两个大范围的；于是阳间有的东西，阴间也毫不二样。尤其是阴严于阳，一切违心悖理，作恶为非的勾当，可以瞒过阳世的人们，却难欺哄阴间执掌因果报应的鬼神。

阴间的所有神祀，一如阳世的官吏设置，大小有分，权柄各别。土地一职，是最普遍的亲民之神。名义划分，有所谓山林土地、家宅土地、衙司土地、街坊土地、乡镇土地、引生土地等等。至于较场坝的土地，则属于街坊土地，其职权尤如阳世的保甲长。

过去渝城内外，勿论大街小巷，都各有一座土地神祠，

为当地各居户所敬祀，界线井然。平时早晚焚香供奉，每逢朔望之期，以及三节时令，更要具备三牲酒礼，隆重的祭祀一次。土地神祠又称“虔巳宫”或“三品京堂”，通俗叫做土地庙。虽然不大，却在本街占据一个面积，有的在街头巷尾，有的则特辟一处空地建立。如无相当地址，则在过街口道或住户铺面之上建一个阁楼，依然金碧辉煌，神灯常照，早晚信香长燃。直到民国十一年间，重庆辟为商埠，先后翻修公路，沿路所有土地神龛，才陆续拆去。但偏僻街巷，则仍旧保留至今。

各处土地，也因环境不同，香火盛淡也就各异，外表和“灵应”也不尽同。重庆有所谓窍角土地、鸡毛土地、三层土地、金土地、红土地、总土地，甚至南岸东里三百梯的“吊膀子”土地（又名风流土地），界石乡的“单身汉”土地等等，都各有其特征、传说和渊源。

至于较场坝土地，自然也有特征，才能有此称号。原来重庆的较场，是清朝武试的考场。上下川东每年的学考，以及三年一届的府考，都在重庆举行。文试场在学院衙门（即今石灰市第三模范市场）。武试场占地较广，在城中心，较场的面积，东起关庙街，西迄走马街，南自十八梯，北止四贤巷，面积达千方丈以上；平时里面设有马号、箭道，供操练学习之用，演武厅即在附近；每岁春秋两次会操，也在此举行。

在考试开始之前，较场内要搭盖许多竹棚，夹成街道，为各种摊贩营业提供场所。考期一过，便又拆除，显出宽大

的广场，故有较场坝之称。

在考试期间，此地也和其它街道一样，并且还有夜市，非常热闹。这么大的面积，又临时搭盖许多棚户，不下几十条街道，却没有一座土地神祠；这里的商贩住户，并非不崇信土地，只因每年要拆迁，故不能建立固定的土地祠。在关庙街口，却有一个，这里是侵扰不到的，平时虽然冷落，但考期一到，临时棚户均来此祭祀，香火很盛，供奉优厚，于是便认为这个土地祠管辖整个较场，久之，便成为地方上的歇后语了。

1949.3.26—27《重庆晚报》

风流土地

据依一般崇信神教者说来，土地虽是官小，但管理一方，乃亲民之神，事无巨细，皆须由彼而达上司。重庆有名“风流土地”者，则非固有其名，而是由于有一位土地神的行动，与众不同，作了一番风流妙事；直到如今，还有遗迹可寻；至于那件外事，则更为本地人所悉，并相互流传。

风流土地，在南岸鹿角场的三百梯，职务系“山岗土地”。因为那里是重庆通往綦江、南川、贵州以至云南的大路，在公路未修筑之前，每天来往的行商不少。这座土地祠，正当三百梯起点之处，立在大路右边。祠内本是两尊石像，即土地佬与土地婆二人。想不到这位有配偶的土地佬，竟演出了一场风流韵事。

清朝光绪中叶，这位土地，也许因事离开任所，顺着小河嘉陵江，到了合州所属的草街子。那里虽属北岸一处乡村，却是热闹的水码头。有一户有钱人家，生了一个姑娘，已经成年，尚未许配与人。姑娘的容貌长的不错。这位土地不知何故，竟看上了这位姑娘，居然同居起来，异常情好。最初，

他们的事，没有第三人知道，这位土地也具有他的法力，别人是不容易发现他的。谁知事情一久，姑娘竟一天天病弱起来，终至卧床不起，精神萎靡，这才引起了她父母的猜疑。

两老总觉得自己女儿一定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事件。但做母亲的，却又十二分相信女儿不会有意外之事，因为朝夕在一起，从未单独外出。但既已有所症象，不能再视而不问了。这是最秘密的事情，两老商量结果，便由当母亲的出面私下诘问女儿。

事情已到不能再隐讳的程度，姑娘不得不说出真实原因来。原来有一个男子，不知从何而来，每夜必到，天晓即去，历时已很久了。母亲推测这男子必系妖魔鬼怪之类，非予以收伏不能挽救女儿性命；便嘱咐待那男子再来时，必须问明其姓氏里居，只要把底细弄清，不愁没法制伏他。

后来，姑娘回复母亲，说那男子并非妖魔鬼怪，男子自称姓土，系巴县人氏，在渝城南岸三百梯坎下居住，家在大路之旁，尽人皆知。姑娘的父母听了此话，以为确有其人，既然木已成舟，莫若联姻为好，只要门当户对，不如成全其事，便动身来渝。到了三百梯，哪知问遍附近一带，并无姓土之人；三百梯上下左右，也没有住家人户；只在石梯起坎之处，有一座土地祠，内供神像夫妇二人。姑娘的父亲，想到那男子自言姓土，莫非就是这土地菩萨作怪？于是便具三牲供品，叩请土地不要再作祟于他的女儿，尤其恳求土地婆婆，大发雌威，不要让其夫在外多事。

说也奇怪，他自从祈祷以后，回转家乡，那男子竟从此绝迹了，姑娘的病也日益好转。更奇怪的是三百梯那两尊土地神像，本来是并排相坐，忽然土地婆的一只手，伸过来拉住土地佬的袍袖，大有不容其擅自走开之势。这座土地庙，至今仍在，确实与众不同，土地婆的手是拉着土地佬袍袖的哩。

1949.4.20—21《重庆夜报》

建文遗迹

距今三百年前的甲申岁，正是明末崇祯皇帝煤山上吊，满清入主中原，这乃是一般熟知的故事。

明朝末期，朝纲不振，上下贪婪奸诈，内乱频起，以致大势倾颓，宗社崩倒，导致其后清王朝统治三百余年。当时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，无法挽回狂澜，只好一死以谢先祖。他哭祭祖庙，杀灭全家，以免蒙受耻辱。

崇祯皇帝在赴祭祖庙之前，先将宫中后妃赐死，并手刃其公主、太子。正当悲惨之际，也是危急之顷，忽然有一个宫中侍驾的阉官，跪请将少太子留生，自愿舍命冒险，背负逃逸，俾给明室保留一脉香烟。崇祯皇帝在悲痛绝望之中，同意了他的请求，便将这个年仅十余岁的少太子交给那太监，趁着黑夜混乱之间，由后宫门背出逃命。这个少太子，就是“建文”。

关于这一段史实，竟没有后文的考证，虽有前人笔录札记，偶然涉及，也是不得其详，众说不一：或谓少太子后来终未逃出京城，死于乱军之中；或谓逃至外处，被闯王军队

俘获杀死；更有一说是遁入空门，出家当了和尚。

可是巴县所属的南温泉后山，确有一山峰名“建文峰”。相传即明末崇祯皇帝的少太子，由那个太监背负逃出，辗转来到此地，感到天下大势已不可挽回，痛定之后，万念俱灰，便隐匿在这个山上，结茅为棚，以遮风雨，君臣二人，虔诚专行忏悔，后来老死山中，在山顶留下一个孤零的茅棚。为了纪念少太子，便取名为“建文峰”。此说如果属实，则可谓万想不到明室的最后一脉，却是远来西蜀，寄迹于巴渝南温泉的丛山之间。

47.5.6—7《重庆夜报》

冥王不在丰都

迷信说，人死都要到阴司，在生属官府管，死后还得受地狱阎罗管辖，世上有天子，阴间有冥王。世俗相传，丰都天子即阴间冥王，驻在丰都县平都山上。每年春季，各地前往朝山进香的，摩肩接踵，道途为塞，沿江停泊香会船达数十百艘，旌旗飘扬，香烟缭绕，由正月直至夏初，每年各方善男信女，耗费于此的银钱，更不知为数若干。

平都山在丰都县城东，高仅数百尺，山上庙宇林立，有如星罗棋布。天子殿在山顶，殿堂巍峨，内供冥王夫妇神像。而天子娘娘相传且为肉体真身，系渝城某商家的女子遣嫁者。故神龛之后，特辟一室，摆设床帐台几，都是天子娘娘的陪奁，如同寝室，因而见者更觉神异。

十余年前，记者曾游丰都平都山。见天子殿分前后两殿，前殿有判官皂隶排列左右，正中设置公案印绶台架，与清代官府制度相同，为冥王问事审案的场所；后殿狭小，仅有一木龛，上供天子菩萨夫妇，娘娘肉身即在此处，着凤冠霞帔，面部小而低垂，为凤冠旒冕所掩，仅有金色闪晃，不能细辨

眉目。当时陪导僧人在侧讲解介绍。记者问："各殿为何不多开窗户，使光线明亮，便于参观？"答："君不闻，神威赫赫之语乎？"记者知僧人误赫赫为黑黑，一笑置之。殿内光线晦暗，更增阴森之感。

一九二七年，北碚镇举行江、巴、璧、合四县联合运动大会，记者代表重庆"商余互助社"携奖品前往参加，承卢作孚先生派员借马，独登缙云山游览（卢作孚当时任峡防局长、治理北碚，有模范镇之称，为该届运动会会长），至缙云寺，住持和尚往右侧一殿参观，殿上亦排列判官皂隶，左右廊下，塑阴司十殿赏善罚恶诸像，形状与丰都天子殿大致相同。殿中也设有公案印绶台架，神像则上坐靠椅，全部装金，身著彩绣袍服，据引导僧人介绍，此为丰都冥王天子。记者问："冥王天子，在丰都天子殿上，何时到此地来了？"僧人说："这才是真正的冥王，不久之前，才由丰都来到重庆，自愿驻节在本寺的。"

姑妄言之，姑妄听之。据说，丰都冥王是在民国十二年癸亥岁，来到重庆的，而且是搭乘木船，直抵渝岸。当其在丰都江边上船时却变化为一中年人模样，与船户讲好价钱。这本是常有的事，丰渝之间的大帮船舟，除掉运载货物外，每每附带载客，名为"散载"，以区别于包船。

船到重庆，停泊朝天门沙嘴，正待搭客付资起岸，却久久不见那中年人走出棚舱外面来，船户只得进去关照招呼。哪知一看，那人竟变作一座神像，端坐舱内，虽为泥塑木雕，但头戴飞龙双翎金冠，身穿五彩锦绣龙袍，再一看袍上所绣

丝线字迹，有“丰都天子”之名，系善男信女所献，始知为平都山的冥王，来到了重庆。

这个奇怪消息，立即传播开去。早有南北两岸、江巴二县各处庙堂寺观的和尚道士、当家住持都一齐赶来，迎请这位菩萨到自己庙内殿上去享受香烟。因为都知道丰都冥王，最为善男信女所崇敬，倘能将冥王接去，便不愁香火不兴旺了。可是各方迎请太多，彼此争执不下，便共同议定，用卜卦来解决，由冥王菩萨自行决定去处。于是，大家分别验数先后，依决打卦。

所有本地庙堂寺院的那些当家住持，虽然恭敬叩求，热烈欢迎，但打的卦，不是阴卦，便是阳卦，可见冥王都不乐意。后来北碚缙云寺的住持和尚，也因闻讯来到这里，挨着前去叩卜，哪知一打便得个圣卦，于是方知冥王是要溯嘉陵江而上，看中了缙云山为驻节之地。寺中僧众，还包括北碚四周的善男信女，便选定黄道吉日，排列执事，敲锣打鼓，焚香捧供，由旗伞导行，盛大隆重的把冥王迎进寺内。从此，善男信女又多了一处可供忏悔祈求，朝拜冥王之所了。

47.5.8—9《重庆夜报》

尿凼菩萨

本地民间有一句骂人的话:“尿坑罗汉”,意为见多识广。哪知正有这样一座菩萨,虽然并非罗汉,其位置却正在尿坑附近,只是这位菩萨享受香火之处在上海,而籍贯则为四川重庆罢了。

公元一九二三年,癸亥春二月,本人求学赴申,住在法租界大自鸣钟旁边的三鑫公寓内,这里距南市民国路很近。有次路过十六铺的洋行街,见斜对面一条小弄堂内,有很多年轻女子进出,都打扮得花枝招展,艳丽非常,后面跟了娘姨,提着香篮烛帛等物,一看便知是长三幺二之类的堂班娼妓,有的还坐了雪亮的包车前来。再望弄堂内,则香烟缭绕,犹如庙堂香会一样。

当时并未十分注意。一九二六年丙寅之夏,二次去沪,住在五马路满庭芳的汇记兴客店。这是一家道地的四川店房,里面的熟人很多,同时上海也有不少同乡朋友,偶然谈到本乡“尿坑罗汉”这句骂人的话,有人便说,上海就有这样一位菩萨,在南市小桥头洋行街对面小巷内,而且菩萨还

是我们的贵同乡重庆人。

为好奇心所动，我便前去观看一番。那里巷道狭窄，弄堂也不深，就在南弄口，搭着一个棚子，下面堆着许多香蜡纸烛，好象有专人管理此事；前来敬香的信士，全系妓流，却并无神龛，也无塑像，就在棚子前的墙壁边，行礼致敬而去。据说，这里原为撒尿之处，后来将尿凼填去，依然有人在此小便，故一般人就称这里所敬的为“尿凼菩萨”。

这位菩萨，怎样又会有“尿”之名，而敬奉他的，又全属娼门中人，且菩萨还是四川籍，便更令人奇怪了。

经过多次访问，才从几个“老上海”处得到结果，虽故事略有出入，但大同小异，加以整理，大体弄清了这位西蜀贵同乡在万里之外的十里洋场落户的经过。

尿凼菩萨的姓名已不可考，时间是在清光绪初年，原籍为四川重庆人氏，是一位贩运麻布的商贾。最初只在本省荣隆二昌至重庆间往来，大获盈利，资本既厚，便打算扩大经营，到上海去做生意。哪知第一次贩运麻布到了上海，就大蚀其本，无法回转故乡，后来竟困死异地，作了他乡孤魂。

这位麻布商人，是想大做买卖的，又系初次去开辟码头，所以尽其所有，购足货物，满载东下。那时交通不象现在这么便利，由渝至宜昌系乘木船，到了宜昌再改乘汽轮赴申，途中几次转口，方到达上海。一面出售货物，一面也要“白相白相”这华洋胜地。初到上海，耳闻目睹，事事感到新奇，眼花缭乱，心动神摇。当时的上海书寓盛行，每当华灯初上，倌人纷出，歌馆酒楼，声色荡漾。这位商人，居然也想

到长三幺二的堂班里去，开怀一番。哪知一经问津，便深困色界之中，不能自拔。好在这些地方，完全注意金钱，只要有金钞同行，包管快活无疆。他便将所有资财，孤注一掷，尽情花用，以博乐趣。哪知有限的金钱，填不满这无底之洞，后来终于床头金尽，闹得嫖士无色。妓院鸨儿爱钞，当然不会同情无钱之客，便下了逐客令。这位商人原也阔绰过来的，一旦处于困境，不但形色狼狈，而且恶病染身，又系足踏生地，举目无亲，告苦无门，沦为乞丐，后来倒卧街头，无人过问，终至冻饿而死。

他死的地方，就是后来一般娼妓敬香之所。至于这般青楼莺燕，为什么要去朝拜这位尿凼菩萨，却是为着所谓“烧路头”，希望自己生意兴隆，能够多遇上几个这位麻布商一类的人物啊！

47.8.8—9《重庆夜报》

火神庙故事

水火两神，为迷信者所崇敬，不但民间信奉，历代官府也很提倡。地方官求神祈雨、设坛消灾的故事，各种小说、历史中多有记载，这自然有久远的历史根源。随着文化普及，科学发达，信奉者便越来越少。现在的重庆，已有消防车队的设置，各街坊也有义勇消防队，备有“水龙”。但在往昔，则沿袭迷信传说。各坊、厢例有“斋会”，定期设坛祭祀，祈免水火两灾；而火神庙与水府宫，几乎各县城甚至市镇都有建立。重庆火神庙，原在四牌坊近玉带街处，即警察三分局所在地，为一宏大的庙宇，且当正街；举行会典，较其他各处为盛。

火神庙于三十年代末期拆去。这所神庙修建得很辉煌，有戏台看楼，正殿中供有火神塑像，高一丈多，彩袍金身，红脸紫须，形象异常威严凶狠；神龛四周围以木栅，朱漆贴金，镌刻有供奉信士的名字，神像光彩非常，从未蒙尘；左右两厢列有神记及各种执事，庙内当家僧人常年供奉香火，按期举行祭典，十分兴旺。

关于火神庙的故事传述极多，据说凡是各地发生火灾，都是属于火神掌管；凡是被火烧的，都不是偶然发生，而是神定灾决；失火这家的祖先，还得到火神处投案，经三代画押之后，方能起火。因此，人们越传越神奇，说每当发生火灾的前几天夜间，便会听到火神殿上脚步声杂沓，人语哄噪。数十年前，正当清光绪中叶，重庆城发生了一场很大的火灾，由下城烧到上城，东起陕西街双火墙，西迄大梁子，南自县庙街，北止小什字，计受灾户口万余，包括川东道台衙门、第一山长安寺等，都被焚烧，乃是百年未遇的大火。传说火灾发生前几天，有一道士，手捧钵盂，内贮清水，在这几条街上，喃喃自语的念着："扳、扳、扳，陕西到长安，双点大蜡烛，红遍一座山……"当时人们自然不知语中奥妙，及至火灾出现以后，才印证道士所说的话，乃是预知其事，促即迁移。"陕西到长安"，指焚烧范围；"双点大蜡烛"，系指川东道台衙门月台坝上，一对高大旗杆着火的现象；"红遍一座山"，说的长安寺第一山，正居火灾中心高处，四面焚烧的景象。每句都有所指。可是明白过来，已经是火灾后，道士也无影无踪了。

这一场大火焚烧的区域，都是重庆城繁盛的商业区，不但受灾户数多，损失也大。事后，火神庙香供和尚便向外传述，事前已有兆象，接连多夜，听见大殿上非常嘈杂，好似有不少人进出，喧闹声直到天亮。——原来这就是受灾户的三代祖先前往画押，办理手续去了。

每当发生火警，当火势正大之际，火神庙的和尚，便立

即鸣钟击鼓，焚香秉烛，顶礼叩拜，祈请火神归位，意在要求饶免；同时还要为龛上供奉的泥塑神像扬扇招风，用巾拂面。礼仪周到，一般崇信的人，认定决不可以马虎草率，以渎神威。

清代，火神每年要出行一次，游经全城各大街闹市；由各商业帮会集资承办，耗费巨大，称为“出亭子”，以消弭火灾，声势盛大。虽然府县城隍菩萨也要“出亭子”，但不及火神热闹。凡是火神舆驾经过之处，沿街两边，不论住家或商号铺面，家家户户都要焚香膜拜，叩求火神庇护。

过去遇着发生大火猖狂不能扑灭时，巴县知县大人便要率领全部衙司差役，亲临火场指挥施救。倘若仍然不能制止火势，或火势迫近知县衙门，县大老爷便要将顶戴袍服脱下，投入火中烧掉，表示“本县已被焚烧”。这与发生大水灾时，知县大人在江岸设立公案，命令差役打“水板子”一样的意思。

对于一般普通人家，遇着邻居失火，如果火势迫近，也有一种迷信的法子，此法也系由火神庙传出。就是将清水一大碗，摆在自家神龛上面，用竹筷一双，交叉作十字形，放在碗上，便可避免火攻，不致遭灾；这与每一次火灾后，“火头”照例要延请道士，为本坊厢“打火醮”时，前往各家各户，消除火星，门外放置水盆一只，内放铜钱十枚，上置铁夹一具，道理相同。

这些迷信愚昧行为，今日看来，诚属荒唐可笑，但在闭关自守，科学不发达的当时，未尝不是人人皆奉为理所当然呢。

47.5.20—29《重庆夜报》

渝城三山

重庆为古州，因创制而称“渝”，立县而名“巴”。至于“山城”之号，乃是抗战时期，外省来渝人口激增，见惯江南、华北平原的外乡人，鉴于重庆依山筑城的形势，取了这个名称，并非以往固有的称呼。

数百年来，随着时代变迁，重庆的城市范围，甚至地形外貌，都有极大的变化。本地志册，虽记载详明，但因时代久远，累经重修，街道增删，已难复旧录。如清代三百年中，曾四次改革制印。自清末同治、道光至民国三十年间，亦曾两易其事，前者为《巴县图志》应世。民国二十二年，重庆便设立“巴县文艺委员会”，从事改篇，力趋新制，但仍循旧范，名曰《巴县志》，内容充实，篇幅增多。遗憾的是古旧故典，未能尽收，例如古代渝城的“三山”，即本文所述者，系重庆固有的形胜，巴县舆史的掌故，对于研究渝城地形变迁，风土故实，规划城市建设，不无参考价值，县志却未记其概略。

“三山”者，为重庆城内的高峰地梁，现在虽早已隐

没不见，或名灭不彰，但形势仍然存在，本地土著，或留心沿革者，尚能忆及。

“三山”是三处凸起的堡峦，鼎峙城内，各有其名，即“第一山”、“太阳山”和“金碧山”，都在城之中部；山上可放眼大江南北，遥望附廓乡镇，百里之内，尽收眼底。这当然是旧时的情况，不能以今日相比。

“第一山”即今日的长安寺。此处为城东最高处，与附近玄天宫相峙而立（玄天宫在今小什字标准钟侧，曾由基督教会购去，改建为福音堂，抗战时期，转让与中央信託局），往昔是一山峦，故名；明万历之前，尚无房舍，后修建佛寺，始有僧侣驻锡其间，至清初，庙宇扩大，正名“长安寺”；山门外彩塑四大天王石像，威武庄严，金碧辉煌，即所谓魔家四将。

明亡，清王朝建立，当时渝城号称“四大家”者，皆属权贵豪门，各占地面，逸养悠乐，广置田园，争显斗富，龙王庙侧的治平寺，亦被赁货淘汰，变菩萨堂宇为园林。寺中原有铜佛两尊，便被移往长安寺内，与该寺原有的一尊配齐，长安寺便益增兴旺，善男信女，朝拜者络绎于途，成为古渝城香火丛林之首。

自清乾隆至民国初年，先后不到二百年，长安寺三次被焚，幸铜佛及四大天王保存完好，依然如故，远近信士，尽力合谋筹备，始克恢复。

长安寺建于明朝，其正门入口处，有一高大牌楼，系泥石建筑，形式庄严，气象宏大，精工雕琢，良匠细镂，中横

牌额“第一山”三字，苍劲潇洒，字如斗大，相传系苏东坡真迹，故为该寺名胜之一，凡游览其地者，莫不留步瞻赏。后遭第一次焚烧，此牌楼亦被焚毁，及后两次重建山门牌楼，仍仿旧样，但总不如以前壮丽，“第一山”三字，亦照旧书，然而虽出自能手，究竟不如东坡亲笔。巴渝民俗，每年正月初一日起，要到南岸涂山真武庙朝拜祈祷，顺道赴黄桷垭老君洞进香，非常热闹，多年来已成习惯。但在早年，则以第一山长安寺为朝拜之所，兴旺景象，不亚于今日朝拜南岸真武庙。

一般香客，于登第一山后，礼佛既毕，即顺道经由滴水岩（即现在兴隆巷）而下，至古西湖池（即筷子街。早年是一大沼泽，阔数十亩，可以游船荡舟，后淤积填平，改建为药王庙。民国十六年，复修作民生女校，曾设宪兵训练所于内，后变为民房)，乘舟到罗汉寺烧香，礼佛完竣，方尽情游乐。

“太阳山”在今民生路、大同路之间，位于城西部，原为一小山堡。清代初叶，渝城因遭战乱，人烟稀疏，至乾隆、嘉庆时代，渐告恢复；但商业市街仍在下城一带，所有官府衙司，也均集于下城。至于后伺坡以上，即今中央公园①以上地面，全为旷野丛林，间有庙宇祠堂散立各处。

渝城位居扬子、嘉陵两江之间，俗称大小河。清晨，日出南山，顺扬子江环绕城区，夕照嘉陵江北。每当午后太阳偏西，一轮红日，冉冉隐没于山堡之后，远望彩霞频射，金光万道，与绿树青山，掩映成趣，益增无穷自然美景，此处

之小山堡，即太阳山。最初丛树小丘，原无名称，命名由来，即因此而起，切合实际。太阳山左侧，初系明代显宦简天官府第，其间庭园广大，布置精雅。后以时势推移，权沦乌有，乃由地方政府，禀明朝廷，改修为先圣庙宇，前贤祠堂，建殿廊，立宏门，辟放生池，修宫垣，长设祭典，此即渝城夫子池文庙之始也。

文庙廊庑之右，即太阳山所在，当最初建庙，曾以围墙隔开庙后，范成数十亩之园林，太阳山亦被括入，虽未设置亭轩，而游人登临，瞻近瞭远，堪称惬意。每逢会期，人群拥挤，争往游览，为全园好的所在。俯瞰左侧，可以遥望嘉陵如带，帆影舟楫，远山近水，不啻图画，江北岸百里之内，尽收眼底了。

后来渝城日渐繁荣，户口增多，此处便成通衢。夫子池周围，陆续改建，如文庙左边，后辟为教育局及巴县图书馆；"魁星楼"往昔亦在文庙范围，以后为拆建街道；夫子池周围俱变为市街，民房鳞次栉比，遂为街道隔开，俨似单独建成；放生池原有矮垣围护，亦渐拆毁。文庙面积便日形缩小了。

文庙后部的园林，亦顺应用需，辟出街巷。如今临江路靠西一带，在未建路前，全系住宅区域，屋舍多为巨大庭院，内多古树浓荫，小园修竹，皆为文庙原有种植，未加拔除，居住者便利用陪衬，以资观赏。

四川创立女子师范，第一女校，设于成都；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，则设于重庆。校址勘就公地，须环境清幽，适宜教读，因在夫子池右侧，以接近文庙，寓圣诲贤能意义。尤

以该处地在上城，远距闹市，兼具丛林丘沼之盛，遥衬山水江河之景，诚属至当之区也。于是便拨划大幅偏右园林，因地制宜，建修屋舍。校之极右，与太阳山间隔咫尺，早晚学生课前休息，可以登临瞭望，从此遂范作该校所有，外人不得进入其间。

光绪末叶，维新教育，对于女学，亦所注重，尤贵提倡妇女生活自立，打消依赖习惯。国内各地，先后创兴各种有关妇女职业训练之组织。重庆士绅，于是合议设立巴县女子职业学校，虽属县立，尤有企冀于先进女学之林。因就夫子池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右侧为址，取性质相近，互相为助之义，兼亦利其环境之适宜也，故定太阳山为基地，建修校舍，招生开课，此后，太阳山遂又一变其原有之丘林面目了。

民国十七年，女职校停办，该处即并入省立二女师，地基亦范入其中，另一部分则改建民房，先后几经更易，物换星移，沧桑叠变，太阳山尤非往常模样，惟地势高峁，凸然有别，至今虽难稽其旧，而形式仍依稀可辨。

重庆环山带水，两岸对峙，城区名胜尤多，旧有巴渝十二景之称。其中一景，叫“金碧流丹”，即指金碧山的天然美景而言。金碧山在城内大梁子偏左，与第一山长安寺相距咫尺，即今中央公园①左上所在。此处地势高峁，正对南岸。早年渝城市况尚未臻于繁荣，上下城情况各殊。下城烟户密集，上城则属郊野，除少数巨家别院，僧道寺观散立，均为田土丛林。金碧山名之由来，是基于这山在上下城分界处，高岩陡坡，一派乡村景色，顺山势有石阶数百级，为上下行人捷

径。半坡上曾有人户，搭有过道棚架，摆设茶水零食小摊，并置条椅小凳，便利行人休息；这户人姓肖，为此土著，故一般称呼这个地方为“肖家凉亭”，积久便为地名，沿袭至今了。

沿石级至最高顶点，即达金碧山。高崖当前，势极峻峭，岩石色赤，即红砂石，此种石质重庆城内并不多见。上到山顶，四望尽系郊野，田土园林，间互纵横，范出大溪涧，引道流水，大梁子等地顺势下泻，向南成渠，偏东之处，蜿蜒流向金碧山。早年，该地又名“后寺坡”，因为适当长安寺背后，沿习既久，今尚留名，这里即正当流水所在（如今日大阳沟、回水沟，瞿家沟、香水桥、响水桥，过去都是往城内溪涧流水经过之处）。

金碧山崖石高矗，流水至此，顿遭抑阻，成为瀑布；自上而下；又因石岩壁立，瀑布散布较宽，衬以红砂石质，极为壮观。每日早晨日出，瀑布被阳光照射，金赤焕彩，光辉闪耀，崖壁赤紫，流水泛桃花之色。月至中旬，玉兔东升，银光洒遍山城，映射山崖瀑布，更觉异彩焕发。每逢早晚，便有不少人前往参观，一览胜景。到了后来，城市渐趋繁荣，大梁子一带陆续成为市街，建修屋舍，金碧山首当其冲，流水由混浊而枯竭，垃圾成堆，便逐渐失去原状。现在欲观旧貌，已不复可寻了。

1948年5月17日—26日《重庆夜报》

注：

①中央公园——即今之人民公园。

九开八闭之故

自从民国十五年以后，重庆开始修筑公路，所有城门，相继拆除，至今尚还存在的，只有“东水”、“通远”二门。在民国二十七、八年间，又新开辟了“望龙”、“嘉陵”二门，现在计算起来，共有十一门。但自明季末叶，以迄清代中世，重庆的城门，共是十七座。

为什么有这样多的城门呢？这在历来的制度上，各有其封建的原因和作用，不过内中有八门，却是水门，现在都早经封禁，通筑城墙了；有的尚有陈迹可寻，遗名可稽。这八道水门，是间隔在至今存在的九门附近，其名称为梅郛、望龙、人和、凤凰、金汤、定远、洪崖、嘉陵。

先年开辟这八道水门的原因，除特殊作用之外，又是备为城内取水之用的通道。试看今日各码头的旁边，都另外有水码头，以前挑水，是由各道水门进出的，直至清代同治初年，八道水门始因故封禁，所有行人，俱由保留的朝天、东水、太平、储奇、金紫、南纪、通远、临江、千厮等九门进出。因此，本地便流传“开九门，闭八门，九八一十七条门”

之说便清楚了。

为什么要封闭那八道水门呢？原来当时着重“风水”之论。因城内火灾接连发生，官府与地方士绅名宿，认为水门洞开，不能克制火星，所以将八道水门封闭；同时又在城内，分东南西北中五处方位，开辟莲花池、西湖池、熄火池、浩池、夫子池五沼；并就城西通远门附近，修建七座石质太平池，取名“七星”。后以此处地势较高，便叫做七星岗，以符合北斗七星之义。至于封闭的八道水门，后来有几处为着便利，便用作城内下水沟的通道了。

原来开辟的十七道门，是顺应风水，讲求生克的关系。所谓正式通出入的九门，乃是“九宫”，用作水道的八门，乃是“八封”，再合九宫八封之象，以示“金城汤池”的含意。而且各门的方位，也是各就对向位置，划分出水旱码头。各门命名，也是或按“五行”，或就地势，或寓形势，或本实况，细加考究而定，由此可想见当初时代风尚的情况了。

1948.1.5—6《重庆夜报》

何为"三将军"

大凡居留渝城较久者，都听说过"三将军"这一名称。所谓"三将军"乃是指的三数，并非仅有一名，至于何为"三将军"，相信人们皆会认定这指的必系三员武将，也许在涂山字水间，曾经遗有不朽的战功，所以才能名昭千古，传播至今。

其实"三将军"并非三员勇武的大将，而且根本就不属于人类，乃是三尊巨大铁铳的称号。在过去时代，兵器还在萌芽之际，虽今日看来乃毫无可用者，但在以往，却曾受过非常的重视，奏了特殊的战功，所以人们为表示崇敬起见，便也称做将军，盖取物与人同之义。

三将军系明崇祯末季，义军张献忠造反时，官府为防堵义军攻城而铸成的兵器。因重庆地势处两江交汇，南北二岸左右对峙，防堵的力量，也必须配合渝北南三岸方面有济，故特铸成巨铳三尊，以备各据一埠。在当时，官兵视此庞然大物，认其具有无穷的威力，流寇祸乱，当不足为虑也，所以别上尊号，直呼将军。另外分特排行，各按行次守护要隘，这是

以将军的威望力能，比拟此不属动物的三尊铁铳。

三位将军的外形伟像和内具机能，虽然一模一样，毫无分别，可是以据守的地方重要与否，却分出了各自的名份。大将军系镇守渝城重庆府，二将军镇守江北，三将军镇守南岸，界线划分得异常明楚。三将军的尊容，见过的人很多，渝城千厮门在城坝上，即有名的“炮台街”者，就是当年大将军的汛地。炮台为石条砌成，周围圆径约十丈，高八尺许，大将军即据炮台上，雄视着长江下游，颇有“休大胆闯进前来”之慨。

其威力究有多大，在战斗中起过什么作用，无以稽考；但本地有一句话叫做“炮打人头山，子落长寿县”，就是形容这种炮的射击情况；“人头山”在溉澜溪下首，距城不到十里。为什么炮子会落到百里以外的长寿县去了呢？原来，人头山附近，有一幅地面，不属江巴二县管辖，而归长寿县所有，故此“子落长寿县”了。(此段摘自《炮打人头山》一文)

直到民国二十三年间，洪崖坊一带改筑马路，炮台方告拆去；就其地修建了一座公馆。大将军的威力已成过去，遂移其遗体置放于附近的城墙垣下，所以有不少人都曾瞻仰过它的威仪。

至于二将军的镇守之地，原系江北；但是三位将军的出生之所，都在重庆方面。二将军要赴它的汛区，自然需要渡过大江，于是便用舟由朝天门码头装运过渡；也许是船小载重的关系，方至大小两江夹码水上，这里还是江北，不幸竟

致沉没，而且深坠水底，连打捞也没有救起；以致二将军始终未能抵达它的驻所。

关于二将军沉没水中，本地便流行着两种传说，都不免是后来人们的附会之谈。一说当时二将军已为神物，故能幻化形态，它知道自己的体肥庞重，运向对河北岸，颇非一件轻而易举的事；它为了珍惜人力，减少众累，遂变化成一个寻常的人到朝天门外乘船过江；船夫是一个老者，二将军又是个人包船，老船夫认为只有一个乘客，并费不了多少气力就可摇渡过河，所以未曾加叫一个推桡的人来帮助；哪知船离开码头，便觉异常吃重，似乎满载一般；老船夫最初尚不以为意，及后来越来越觉费力，大有推运不胜之势。本来二将军是铁般巨重的肥体，一只细小的渡船，一个老弱船夫，如何能够胜任，把它顺利的运送过去呢？使了绝大的气力，好容易船到江心了，这才仅完成一半的水程，老船夫不禁向着二将军道出他心里的苦闷说："你真是铁一样的重啊。"这句话虽然出之无意，可是糟了，"仙机不容泄漏"，二将军的真相被人识破，遂无法再隐，立即显化出了本来形状，骇然一尊巨铳，小船当然不胜装载，以致立告沉没。

在扬子、嘉陵两江交汇的夹码水下，却传有神庙一座，名叫"金竹寺"；朝天门码头的石级下完，便有一高大石拱桥通达寺外山门口的月台，二将军沉没水中，却坠落在石拱桥上面。据说是某一年江水枯退，渝北两岸有如相隔一条濠沟似的，有人发现江中心凸出一物，色黑放光，荡漾于夹码水面，因此人们方始知巴二将军坠落在石拱桥上的传说不错。

三将军的汛区本在南岸，坐镇的地点，系今大佛寺前名称“石龙过江”的上首。此处适当下游，正对水道的来路，真算一将当关万军莫入的要隘。至于三将军的下落，则传说早已成神物，隐去无踪了。其能成神的原因，系因它所在之处，与大佛寺相距咫尺，这是巴渝丛林之一，寺内每逢朔望两期，有讲经说佛的盛典，它参与其间，虔心佛法，皈依三宝，因此甚得超度，居然依神隐去，真是莫大的造化，这也不过是地方的传说如。此更有一种神乎其说的，据言三将军是隐在大佛寺后面花园丛林，曾经有游人偶然走到后面，忽然瞧见一尊巨大铁铳，昂然竹树林中；那人连忙呼叫同伴观看，不料一转瞬间，顿失所在，方才恍然大悟，乃是三将军的法身，有缘者可能在无意间获瞻仰的机会，否则那就休想看见它的威仪。

三位将军的镇地，当然都是要隘。二将军雄据北岸；三将军所在的大佛寺，更属胜迹名区，这里正对着人头山右下为“铜锣峡”,左上侧“呼归石”,形式配合得当，非特兵家认为险要之区，一般勘舆家也称其为风水龙脉归宗之处。自明清以来，很有不少研究地形的人，曾历越很遥远的途程，饱尝辛苦，翻山越岭，顺着山势水径，先后追寻到此。

曾有勘舆学者，从贵州顺着龙脉，步行来到重庆，真不知费了几许跋涉的辛苦，经历过若干风雨的打击，他忍耐着，非穷其究竟不可。后来终于找到了龙脉归宗之地，正在渝城南岸大佛寺。按照形胜看来，乃是一幅阴地，人有葬此者，其后嗣荣显，真有难以限量之概。

然而这位眼高学富的勘舆者，自己知道无福葬在这里，他特地把费掉一番辛苦得来的结果，留示给后人。他在大佛寺前题的字迹，昭告人们，指明来由，其辞为七言韵话，并详述地势形胜曰："真武山前一脉来，此地流来在东台，铜锣峡内旋旗挠，人头山作点将台，呼归石上青烟冒，大佛寺前挂玉牌，有人葬得此幅地，一代一个状元来。"

自从这几句题词揭示出来以后，引得远近的阴阳先生，都来追寻探视。有的富贵人家，则不惜重金延聘勘舆之流，前来寻觅所在，以便葬其先人，发达其身。后来竟被本城一家富绅请的一位地理学专家确定了所在。这家富绅是用来安葬母亲的，便遵照指示，饬工开井落葬；哪知正是此刻，忽有小鸟飞来井旁树枝上叫个不止，其声"吸吸呢"；这位地理学专家神经过敏，他听来俨然为"不是地"，心里不免起了动摇，自己怀疑容之未妥。即忙说："此地尚待斟酌，改期再为下葬。"富绅家便遵嘱暂缓安埋，又复详细考察，确认地实地址，并无差错，乃决定再择期下葬。不意临期前往，该地已经被人埋占了，即向寺内叩问葬者何寓？据答为江北胡姓的老母，这样恍然悟到，目前小鸟叫声系"胡比地"，足证"福人葬福地"之说，并非虚语。

三将军的镇地，所以相在大佛寺前，可见不是随便的事。兵家动止，首重地利，古今中外皆然。直到现在，这里仍属巴渝胜迹之一，给人们以掌故的追念，岂是偶然的么？

1946年《重庆掌故》

三铜佛由来

重庆城内第一山长安寺，在一九三九年被日本飞机炸毁前，寺内正殿中龛供有铜佛立像三尊，各高一丈开外，神态庄严慈祥。居中系释迦牟尼，左右是文殊菩萨与普贤菩萨。这三尊巨大的铜佛，不但香火兴隆，而且名著遐迩。长安寺为本城远近皆知的庙宇，进门四座高大的天王石雕像，称为四大天王（即魔家四将，据封神演义记载，系殷商纣王镇守青龙关的弟兄四人，名魔礼青，魔礼海，魔礼红，魔礼寿）。长安寺的名声，与三尊铜佛有很大的关系。

长安寺为巴渝古刹，清初已颇著香火。每年春正元旦，地方人士，登第一山朝拜祈祷，情形有些象后来上南岸真武山老君洞那样的盛况。正殿供的铜佛，只有一尊，即正中的释迦牟尼像，考其塑造年代，乃明朝万历年间，有文字凸起于背后中部；至于左右两尊铜佛，原不是长安寺所有，而是

治平寺正殿所供奉的。治平寺在龙王庙左侧，即现在警察第一分局左旁①，新中旅馆所在之处。因治平寺后来拆建民房，便将两尊铜佛移往长安寺，配供一处，分列左右，这时已是清咸丰末年，距今不过一百多年。

治平寺的两尊铜佛，也是明代铸塑，背后中部也都铸有阳文字迹可考，时间是天启年间，岁月较长安寺铜佛为迟。明代崇尚佛教，历世皇帝皆笃信禅宗，不仅在各处名山修建了很多庙宇佛塔，还铸塑了不少佛像，只要有奏请布施功德的，朝廷都下旨颁给。相传渝城这三尊铜佛，均不是本省塑造。万历年间那一尊，系由京都运来；天启年代的两尊，则由陕西方面运至。其间朝代既有先后，年岁又有迟早，表面看来没有差异，实则居中一尊，要高一尺多，两旁配供的，刚好矮一个头。身形也略有大细之别。想是明万历时，正当鼎盛之世，府库充裕，一切举措，自是不同；天启已届末世，虽然同样的尊崇佛法，究竟运用不能自如，所作已经显得拮据了。治平寺的两尊铜佛，在先也许并未料到会移到长安寺去与那一尊同供的，这里面有人事的变动，以及环境的变迁，岁月的转移，因此无知觉的铜偶菩萨，也尝到了人间的沧桑！

治平寺也是渝城古刹，与罗汉寺望衡对宇。其初，范围比罗汉寺广，除正殿置有两尊铜佛外，尚有五百阿罗汉堂，大山门正对古西湖池，香火之盛，为全城所有庙堂之冠。明末清初，张献忠入川，重庆遭受战乱，治平寺也遭到破坏，不但庙堂摧毁殆尽，所有住持僧侣也全部逃走了。

清兵入关，建立了清王朝，重庆四大名家之一的王应雄（前明大将军），广事插箬，修建府院，布置庭园，治平寺被圈划在他的范围之内。好得王氏崇信神佛，特为菩萨留一地基，给治平寺辟出界垣，附于王氏土地的偏南，并稍事修整，聘人看守，早晚燃香供奉。但治平寺已大非昔比，香火冷落，到后来甚至没有人去朝拜了。

清咸丰、同治年间，王氏家族已经衰败没落，住宅庭园，也陆续分割售卖，先后改建民房。同时渝城日见繁荣，人口逐渐增多，已往原为荒林园圃的上半城，大部变为市街，王氏旧址因环境变迁，开辟街道，更拆掉不少，早已失去原有的面貌；治平寺更破落不堪，成为虚坛废宇，住持香火迫于常年开支无着，生活困难，竟招揽住户，将庙舍分散租与居民，到后来便成了一个大杂院。

杂院里面的住户，成份确实很复杂，既有肩挑背负、靠出卖气力为生的劳动者；也有擦粉涂脂、出卖肉体的妓女；还有梨园弟子、官府隶役。右邻的罗汉寺大和尚庆元，是一个能干的僧人，结交官府绅商，广事扩充庙宇基地，已据有江北相国寺等庙，又特地请当时重庆知府彭循、巴县知县沈正修，维持功德，将治平寺划与他接收，肃清杂院住户，出售地皮，维修院舍。拆迁的地区，则成为巷道，并用“治平寺巷”之名。至于原有庙址，则以右幅划给紧邻的龙王庙增设后殿；五百阿罗汉堂则归并与罗汉寺；那两尊铜佛，便抬往第一山长安寺内配供。一九三九“五·三、五·四”日寇飞机轰炸重庆，长安寺被炸毁，三尊铜佛被摧倒，长安寺当时

曾就地搭棚保护，后来移藏室内，预备将来重修庙宇时，再搬出来供奉。

1947.7.14--15《重庆夜报》

注

①即现消防总队停车房附近。

独家稻香村

“稻香村”糖果糕点店的牌名，相传出自苏州。在苏州城区热闹中心，正当“玄妙观”外一带商铺，多系售卖糖果糕饼。苏州人对点心很考究，注重口福，视糖果糕饼为日常必需；故经营这一行道的，便极力制作，花式百出，品类齐全；同业之间，互相竞争，精益求精，力树名声。若干年来，苏州六大糖果店，当推“稻香村”为全业之冠，远近驰名。

后来“稻香村”的学徒、师友，以及本家房系，出派分支，各设店铺，都用“稻香村”之名，以广招徕。于是不仅苏州一地，其它城镇，也都有了“稻香村”;店主也都与苏州观前老店有所渊源，无关的局外人是不能擅用此名的。

重庆原来没有“稻香村”,制售糖果糕点的店铺，都称“斋馆”,多为回民经营，故有“教门斋馆”之称。门前柜上，悬挂黑漆金字小牌一面，标明“清真教门”,以示与其它糖果糕点店铺区别。

教门斋馆挂牌的目的之一，在于标明所做荤食品中，不用猪油，茹素的顾客，可以购买。重庆过去著名的教门斋馆，

有大什字的"五福斋",新街口的"永和斋",都是开业数十年至上百年的著名店家。世代相传，历史悠久，名传巴渝。糖果业虽遍布全城，但仍以教门斋馆居多，名声最著，顾客购买，都注重教门牌名。

重庆地区，视糖果糕点为茶食点心，多用于馈赠亲友，所谓"水礼",不象江浙各省嗜好。川人喜在饮茶之间，闲坐之暇，以糕饼佐兴。糖果之后，仍需备饮，故"斋馆"除制作糖果糕点外，兼营菜堂,虽门面狭窄，排场大小各有不同，但经营方式却基本一样，都是半设柜台，半置桌凳,俗称"双合铺面"。在三十年前，一般斋馆茶堂，每一桌上，摆有锡水壶一把，顾客可以自行添加开水，堂倌则往来调换水壶，至今川北各县城，仍然如此。

重庆较"新式"的糖果店铺,在二十年代初期方有开设。现在普遍制售的水果糖、酒其马、蛋糕、饼干等，以往是没有的。过去斋馆制作的，则视为"旧式"点心，一般已不宜作礼品馈赠，如绿豆糕、白果糕、杂糖、蜜饯等；但其中滋味各别，品种繁多，自有其特点，在本地老牌糖果店中，仍可购到，亦可慰情思昔。

至于"稻香村"在重庆出现，为时颇早，远在三十年前，民国三年（一九一四年）春季，系一位浙江人开设，地址在今陕西路中段,"鸿升堂"巷右侧，即中央合作金库对面。开业之初，专门制售糖果糕饼，并不附营茶座，与重庆一般斋馆不同；至于所有产品，完全江浙花式，别开生面，独树一帜。这第一家稻香村，租用两间门面：左面一间，隔

有木板，开有窗户，设置条案炉灶，是为作坊。内部的师傅工友，以及柜上经理人员，全系江浙籍。当时长江交通不如今日之畅通，外籍人士也不如今日众多，少所见而多所异，一旦新呈花样，别有创新，便引起一般注意与好奇；这是第一家稻香村在渝开创时，大获赢利的原因之一。

该店作坊濒临大街，窗户洞开，可以从街上瞧见里面一切情形。当其尚在准备开张营业、制造应市货品之际，工作十分忙碌，房内炉灶炭火熊熊，案板上刀声刹刹，厨师匠人为数众多，操作赶工讲说谈笑，吴语喧哗，引起来往行人停足凭窗观望，果见所制糕点式样新奇，种类繁多，全与本地斋馆不同。于是，视为稀奇，辗转传告。所以该店自身并未大肆广告宣传，尚未开张，早已哄动全城了。

及至开幕之日，店门未启，已有人拥挤等待；刚一开门，柜台周围竟挤满人群，秩序混乱，甚至街道堵塞，交通停止，只闻一片喧闹之声。店中人慌忙应对，取货收款，包扎递交，近乎漫无头绪，内外繁杂，呼叫声不绝于耳；不少前来购买的顾客，被摒门外，无法挤入，这种盛况，在重庆不曾有过。当天营业兴旺，不到数小时，所有新制时鲜物品竟告销售完毕，货架空空，只好提前在下午打烊。

这第一家稻香村的产品，虽不出甜咸荤素的标准，唯因制法及外形与本地各斋馆不同，故能引起注意，由好奇而哄传，致生意兴隆。其实在原辅材料上，亦并无多大不同，兹举两例便可想见一般。一为蛋糕，本地原有的为四方形一种，稻香村则分为梅花式、手巾式，及白色（纯用蛋清调兑）

长条大块、双层夹心等多种样式；又如鸡蛋酥，本地原已流行，稻香村则有洒其马（此系满洲点心），且分别制成黄白二色；其它如年糕、蛋黄元（又名西洋饼）、软酥、京果等品种，皆要形式不同，或色彩各别而已。一般人视为新奇，少见多怪，莫不购买一试，由此可见营业必须谋求创新改良，方能致获大利。

除花色新颖，产品新鲜外，稻香村所用器皿及陈列布置，与乎经营的方式，亦与本地不同。其门面整齐堂皇不在话下，至于盛装各种糖果糕点的器皿，大多采用特制的竹笼本地原有的“蒸笼”，但外涂以漆，鲜艳悦目；其它台架箱盒，俱为定制，并各有花式雕刻，极引人触目，增进了产品的外观；顾客购买物品，勿论多少巨细，一律包扎绳捆，便利携提；所有绳线，染成红色，包装用纸印有店名，均很考究，无一不超越本地习惯；店员对买主和善亲切，拣选取送迅速敏捷，亦较本地店铺为优。凡此种种，皆属商业竞争之操胜算者。

渝城糖果店铺，以往无饼干、水果糖等品种。此类糖点，出现山城亦不过二十余年，但并不是从第一家稻香村开始。可是自那以后，各店仿效模拟，继起直追，互相竞争，各出新品。第一家稻香村的品种，仍属普通糕点，不过花样格式不同而已。该店开业不过半年，据说由于伙友匠师各怀打算，互见大利而分裂，自谋发展，便告停业，瓦解冰消。

不久，渝城竟有数家新型糖果店出现，开设于闹市大

街，但门面陈设均不如头家稻香村阔气，仅格式相同，产品相似，一望而知不同于本地斋馆；且招牌名称亦系新拟，店主也不尽是外乡人，或与本地合资经营，或系本行雇请匠师，意在投应时机，有利可图。但这样一来，反而见惯不惊，业务并不如头家稻香村好。于是，专务其业者，便寻找改良进步之道，新旧掺合，内外折衷，既集原斋馆经营的精美糕点，亦销外地传来的新式糖果。

至于现在，本城糖果业已面貌大变，"斋馆"已全部为新型糖果店所取代，且引进了西式糖果糕点，花色品种繁多，成品已非往昔可比。近十年，"冠生园"、"大三元"、"采芝斋"、"好吃来"等，相继在渝开业，风气转换，顾客亦不再求取陈物；欲一忆尝旧日道地渝城斋馆所制之风味，则需细加寻求，或许偶尔可得。

1948.5.11—16《重庆夜报》

重庆的浴室业

居留在上海、北平等地较久的人，会不知不觉养成一种习惯，就是到浴室去沐浴。现在重庆也有了浴室营业，但时间不长，是在抗战的前一两年才有的。

民国初年，重庆的浴室业，还是绝无仅有的。所谓仅有，因为确实只有一家，那就是开设在金沙岗上的岳阳楼。

因为早年人们对于浴室，都认为是家中的事。到了冬天，也是自备火盆取暖洗浴。后来，“岳阳楼”浴室开业，依然得用火炉御寒，不过每一个盆塘之间，用木板隔开，挂有门帘，似觉比家庭舒适方便，人们才乐于前往，并呼为“洗澡堂”。

在夏天，就根本不需上浴室了。“岳阳楼”的浴盆是木制的，用竹管通水，名叫“自来水”，设备十分简单，只有冬天生意较好。后来大梁子“优胜旅馆”开业，附设浴室，用铅管通水，并设磁盆，比之“岳阳楼”就漂亮多了。

民国十年间，商业场“话语楼”下的“浣薇”开业，这是一个比较完备的浴室，内分磁盆、汀盆，旁边附设理发室。

自此以后，重庆的浴室业，才算有了新的进步，业务也开展起来。“浣薇”的规模较大，内部布置和设备，也尽量仿照申汉等地澡堂的形式，而且有单人房间洗澡，更觉方便。

旅馆附设浴室设备，为时不久。如大梁子的“世界饭店”，肖家凉亭的“其春旅社”等，虽附设有浴室，但都是独立性质，与旅社相邻而已。直到民国廿年间，中央公园内的“涨秋山馆”，每套客房都备有浴室间，营业兴盛。于是其它旅馆，相继效尤，或设家庭浴室，或辟特别包厢了。

至于大池，最初本地人无这种习惯，一般浴室都不设置。直到民国十八年，木牌坊的“西南饭店”开业；楼下浴室特设大池，在重庆算是创见。开始时，前往大池洗浴的，多系外省人，偶尔有在轮船上任职的本地人前去，慢慢的才有较多的人去洗大池了。以后继起开业的浴室，便都设置大池，同时除擦背修脚之外，敲腿、捏趾等也相应有了。

妇女浴室。因为重庆根本就没有妇女去外面洗澡的，所以没有专门的女子浴室。后来，“其春旅馆”的浴室附设女宾间，随着则有平民浴室，辟专室招待妇女。最初去女浴室的，都是花界妇女，后来风气开通，才逐渐有家庭妇女前去沐浴。

此外，还有一种浴室，便是城外沿江边的“船上澡堂”。用一艘木船隔成内外间，价格便宜，空气流通；现在临江门、南纪门、太平门三处，各有一、二只木船营业。夏季沐浴，既感凉爽，又可浏览江山景色；只是就浴的人极其复杂，浴巾也不够卫生；但颇适应当地劳动界人士的需要。

以后，中央公园内，开设了一家又经济又卫生的浴室，先购买牌子，自己端水到分隔的洗澡间，肥皂、毛巾一律自带，取费虽低，但究竟麻烦，不久便停业了。

1947.9.9—10《重庆夜报》

重庆的人力车

重庆于一九二七年（民国十六年）开始修建公路，最先建成的，是城外通远门至曾家岩一段。车辆行驶，也只能往来于这一段路程内。后来，城内的路线先后修成，车辆通行的范围才扩大了。

当时，只有数辆小汽车（轿车），都为军政要人所有。公路上通行的，主要是人力车，俗称“黄包车”，最初，只有二百辆左右。后来随着新建公路、街道拓宽，车辆数量也随着增加，最多的时候，有过九千多辆人力车。

人力车最早在重庆出现，却远在清代末年。那时既无公路，当然不能营业。宣统元年，重庆举行“赛宝会”，盛况空前，适成都方面由上海购了十二辆人力车，途经重庆，正值会期，便用来在会场行驶；一般人认为不过是新奇好玩，并非用以代步，会后也就运往成都了。

到了一九二五年，市政当局着手筹建公路，曹家巷“宏胜钱庄”有一位姓胡的商人，自备了私家人力车一辆，每天往来于五福街至下半城一带。当时每当停下，许多人感到稀

奇，争往围观，数月后这辆车也就不知所终了。

两三年后，市郊的公路逐渐修建，重庆市面上才正式有了人力车行营业，招雇力夫，出租车辆，一般人也用以代步，从此成为重要的交通工具了。

在开始流行人力车时，还发生了一些意外。由于拉车人技术不熟，车辆结构不完善，重庆又系山城，故翻车的事时有发生；甚至出现将行人撞倒、车后的铁条将倒下的人肚皮刺破、致伤致死等惨剧。

私人包车的盛行，是最近几年的事。公司行号，经理老板，置备私车，以图舒适，或显身份，也有预付押金临时租用一两月者。

1947.9.11—12《重庆夜报》

重庆的川剧科班

川剧科班在重庆演出，清朝末期就有了；但都不是本地组织训练，大多来自川南、川北等处；至于重庆组织本地科班，已在民国开元之后。最初的本地科班，名叫“普益”，由罗文江创办，于1915年（乙卯）四月正式开科设场。

罗文江是江北人，乡间土著粮户，拥有不少资产，喜好戏文，思想也比较开通，平时参加“玩友”打唱，自己又略解文字，便将一些剧本的词句修改，编成零星成段的新唱词。

最初他以开设戏院为业。早年戏院通称茶园，如民国初年朝天门接圣街的种德堂药铺侧的“阳春茶园”，江北汇川门外的“汇江茶园”，都是罗文江独资经营的，并且获利还不错。后来便单独设立了“普益社”，创办科班，招请一些川剧各行老角，分别训练儿童；宣称创立的宗旨是“改良戏剧，救济贫苦子弟”。

四月间成立后，不久改为“普益科班”。所有科生全系江北县本地的穷苦儿童，有的是完全无依无靠的孤儿，有的是

父母自愿送去学习的，全为男性，无一个是坤伶，人数约四五十名；地点设在江北问津门城垣内，自建了一座捆绑瓦房作厂棚，内设一个小戏台，每日闭门教习，很象一所学校。

经过了几个月，便开始边教边演出，正式设卖茶座，每天分上下午两场。一般人很感新奇，去参观的很多，同时收费较低，看客拥挤。科生中各种脚色俱全，也有资质聪慧，演唱出色的，生、旦、末、丑，均有佳才。科生的名号便以“普”字为标准，用各人本来的姓氏，配上所习行道取名，如旦角王普伶，邱普珑，小丑王普相，小生张普万等。张普万即后来在各川戏院搭班的张绍华。

前后训练了一年多，便正式对外公演了。罗文江特地在江北正街修建了一座新戏院，面积虽不算大，内部设备，按当时的标准，却算相当精致了。这座戏院取名“重光茶园”，茶园开幕之日，就是普益科班正式对外公演之期；当时特地邀请各机关团体的负责人，以及县官、驻军到场参观，轰动一时。

普益科班演出时期不很久，便因罗文江去世而解散了。所有科生，也分别在本地或外埠戏院搭班求生，只可惜人才不多，渐渐便被人们遗忘了。

继起者为“裕民社”，这是重庆第二个科班组织，一切已较过去进步认真，科生中也出了不少名角。“裕民社”原在西二街东舞台演出，是一个组合的班底，各行均是一时的著名伶人，如正生褚安平、卢草廷，小生胡建廷（川剧坤伶胡漱芳之父），小旦罗芹香、钟香玉、伍碧臣，丑角傅三乾，花面

赵瞎子（焕臣）等，堪称重庆唯一的川剧班底。后因市政府一位叫李大钟的科长邀约，便用“裕民社”的名义，训练了一班科生。

这时已是一九二六年丙寅岁，重庆号称新商埠，由潘文华任市政督办。李大钟因爱好川剧，决心改良。他曾参加过卸任巴县知县的袁恩煌和本地人冯什竹等发起组织的“二二俱乐部”，编有《刺雍正》剧本。裕民社科班，便由他一力负责，招请名角分别担任教师，进行培训。这个科班的地址，便设在九尺坎。

裕民社科班正式公演时，已在后祠坡（即现在的中央公园上首）自建了一座戏院。科生男女兼备，旦角全部是坤伶，成就已比普益班大为不同。优秀演员如李筱钟（李大钟之女）、周金钟、周裕祥、刘裕能等，堪称特出之才，营业的时间也久，还曾西上赴成都等地演出。后李大钟去世，主角之一的李筱钟又因爱情自杀，主持不易，便告解体。此后便再没有科班发起了。

1947.8.10—11《重庆夜报》

附：

川剧坤角的由来

川剧班本来没有坤角。坤角的出现，在宣统元年。当时梅子坡的“萃芳茶园”开幕，由本市一家姓魏的主办，特从上海雇来女班京剧，俗称为“髦儿班”，主要角色都是坤角。坤角中最有名气的如郭少娥、郭凤仙、七盏灯、月月红等，一经演出，本地耳目为之一新。

到了一九二〇年（甲申）左右，才有川剧坤角出现，是旦角。到每年秋季枯水季节，江岸退出大片沙滩时，有一种专跑水码头的戏班，以船为家，每到一处，就在岸边扯起布幔长帏，搭起小型戏台进行演出；角色当然不多，却夹杂妇女文行在内。这种流动卖艺的戏班，一般人统称其为“真旦角”，由于文行是妇女扮演，便觉新奇。观众对象也为一般码头上下的劳苦群众。这些旦角，在技艺上谈不上什么造诣，表演也呆板，唱念更是黄腔顶板，至于化装，简单得不成样，甚至没有什么道具，穿着平常的衣服，加上粉红，戴上花朵而已。

关于重庆的戏院

清朝宣统元年，重庆才有戏院开设。有一个时期，戏院曾称为“舞台”，最初则叫“茶园”。这些名称，都是仿照沪、汉、津、京等地而来的。

尚未兴办茶园以前，演戏的地方，只有会馆，庙堂、乡镇，以及私宅的喜庆堂会。喜爱看戏的人，除了有机会应酬，参加各种祭典、宴会之外，平时是很不容易看到的。

宣统元年，重庆举办“赛宝会”，场内开设了一家戏院，名叫“同乐茶园”，由川戏“义泰班”在此演出。虽是临时搭盖的竹篾棚，但面积较大，四周架有环楼，作为女宾看台。戏台前一行一行摆着条桌，上置白布，放有花瓶，上首及左右有靠背椅，下方空着，如私宅演堂会戏一样布置。

茶园内有茶房服务，观众每人泡茶一壶，桌上有瓜子、花生米等点心零食碟子，一面看戏，一面可吃零食。茶房川流不息的打毛巾，掺开水，收小费。每天演出两场。当时尚无电灯，只能用煤汽灯照明，故傍晚即停止演出。

清末，重庆的戏班已有数种，除川剧外，还有汉剧的“泰

和班”，陕剧（俗称老陕班），科班（娃娃班），京剧尚未入蜀。川剧又有“义泰班”、“鸿泰班”、“泰宏班”等。每班都各自拥有名角，其中尤以义泰班最为著名。

义泰班的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齐全，且为观众称道。生角中有李海生、褚安平、卢草廷、赛韦陀、马魁扬、胡建廷，净角有赵瞎子、李犇、廖莽陀，末则有包谷团，丑有九根毛，至于旦角，则更多了，如郑五、周四、尤春蓉、张桂蓉、伍碧臣、赛四妖等。

赛宝会的这个茶园，便是重庆最早的戏院，此后便陆续发展起来了。

赛宝会闭幕，同乐茶园迁入城内陕西街余家巷继续营业，利用梅郭庙内的万年台，当中的坝子用木架垫高，左右两厢的“苏楼”仍作女宾看台，内部布置仍与赛宝会一样。观众入场由先购牌子改为彩色纸印的座券，入门处专设售票处。如观众入园后再购票，在门口收票的人便大喊“代票一位”，于是专门的流动售票人便随后跟来收钱扯票。

茶园创兴之后，其它如餐馆、茶楼也相继开业，一时风气大开，景象一变，所谓“文明”、“改良”、“时新”、“开通”等名词，也跟着在人们口中谈论了。由于多年封建统治，内地民俗究竟比较固执，男女界限十分严格，茶园里虽有楼座接待女宾，也只限白天可以男女合观，夜间只售男票；男女宾进口，也是分开的；有一个时期，女宾进口处，还由治安当局派武装士兵把守。女宾看台上伸出一级短楼，设置长条矮凳，供随行的小孩坐看，考虑十分周到。

照明的煤汽灯由上海购来，若遇演神怪戏如《耿氏上吊》、《活捉刘氏四娘》之类，便用绿色彩纸临时把灯包起来，增强效果。民国元年，烛川电灯公司成立，各茶园才改装电灯，但光线微弱，夜间仍须辅以汽灯照明。

"同乐茶园"由赛宝会迁进城内后，不久，梅子坡的"萃芳茶园"（即龙王庙对面，过去的章华大戏院）、机房街（即民国路）的"悦合茶园"、白象街的"大观茶园"、花街子的"渝舞台"、大梁子的"华章大舞台"（即今一园电影院[①]所在）等也相继开业，可谓盛极一时了。

当时的茶园，秩序很差，入场人数没有限制。每遇好戏或名角登台，便在楼上楼下尽量安座；茶园老板为增加收入，照例备有许多竹凳，平时堆放一边，遇到人多时，便不管背贴肩靠，尽量安插；甚至堂后和两边的走道，也售票让观众站着看戏。实在挤不下了，才关门禁止再入。

由于这样，秩序既乱，又因防区时代，驻军复杂，经常在开演不久，忽然观众席上某个角落轰闹起来，接着四座哗然，全场起立，转眼间竹凳与茶壶齐飞，呼儿喊妈之声同叫。戏台上更成为众矢之的，什么东西都向台上掷去，顿时秩序大乱，男女老幼慌忙夺路而逃。本来是观赏娱乐的事，结果以惊吓和悲伤收场。

治安当局对此自然关心，茶园也慌着急谋防范，消除混乱。因此，民国一、二年间，四川督军熊克武便举办宪兵，司令部设在蜀军政府侧（现西四街）。宪兵的装备和待遇均较一般军警好，灰色制服，用东方亮缎镶袖口，花纹纹边，佩章

用白铜镶金，腰束皮带，脚踏皮靴，挂一柄三尺长白铜鞘的拖刀，金黄挽手。三个一班，五个一队，在街上川流不息的巡逻，勿论本军客军（当时重庆驻有滇、川、黔三省军队）的兵士，在路上相遇，都要站在一旁，立正敬礼，让宪兵过去了，方能动步。各茶园便由宪兵前来弹压，在观众席的中部靠后，特设座位，尤如供奉神像，以资镇慑。

民国三年，北洋军阀势力显赫，曹琨率北军入川，驻扎重庆学院街门（今石灰市），宪兵便告瓦解。接着内战不止，城内巷战，多次发生肉搏，各色队伍此来彼去，经常有许多不同番号的军队同时驻扎，不但娱乐场所经营困难，其它百业也受战乱影响。由于重庆已开商埠，驻扎此地的部队，都设立了“驻渝办事处”，各自标明隶属番号。为了维持地方治安，曾由各军共同组织“各军驻渝联合办事处”。同时又产生了“军警联合督察处”，派了大队武装士兵巡游街市，每队由一队长率领，前面由一名班长手持特制的“令箭”，凡军人遇见，必须在一旁立定向它敬礼，队长则骑马随后，并随带木杖等刑具，可以就地执行惩罚。罪重的，则逮捕回处究办，还有执行死刑的权柄，真是威风十足。

于是所有茶园过去特设的“宪兵座”，便改为“督察座”了。督察巡逻队又称为“弹压队”，座前有一张桌子，蒙着白色台布，上首正中，特设靠背大椅，为队长的位子，其余两边，则散坐武装士兵。勿论午场夜场，每当开演不久，这批弹压队便来了。进茶园门时，先吹一声口哨，所有在场内看戏的穿军装的人，必须一律起立行注目礼，同时戏台上暂时停

演，并由“软场面”吹打一番，以表欢迎。

弹压队就座之后，再吹一声口哨，穿军装的看客才能坐下，同时台上继续演唱。弹压队除在场内就座镇慑，在园外男女观众进口处，也临时派士兵持枪守卫，约在演出结束前一时，便全体离去。临走时，又须照例吹口哨，起立，吹打欢送一番。

法严自然为治世之方，但也并非唯一良策。娱乐场管理如此严密，仍有不畏法的暴戾之徒，不管律例怎样厉害，竟以捣乱为习。当时王陵基担任“江巴城防司令”，最初确也收到一定效果，渝北南三岸，治安情况一度安定，虽然偶有纠纷，无碍大体，人们对于“王灵官”，很为敬畏。

可是镇压只能收效于一时。不久，地方上的不幸事端又接连发生，茶园里又出现过去那种混乱，肇事者除军人外，还有流氓鉾神，互相狼狈为奸。城防司令部便采取更严厉的措施。一旦哪里出事，只要把肇事者捕到，立即究办、采取速决，并不拖延时日，一经审明事实，马上就地正法，予以处决。由于在茶园发生纠纷而被捉到处死的，为数很多，都是在哪里发生，便在哪里处决，茶园门外，简直成了杀场。如梅子坡萃芳茶园、白象街大观茶园、朝天门外的汇江茶园等处，都处死过人犯。而由于其它案件，也采取就地正法的措施，便有遍地杀场之谓。

茶园改称“舞台”，是在民国五年之后。大梁子新开了一家戏园，招牌叫“华章大舞台”(即今“一园”)，建筑形式仿自上海，并以机器转台、特别布景为号台。自此以后，商业

场修建完竣，西二街也开设了一家戏院名“东舞台”，厚池街内开设了“渝舞台”，上大梁子还开了一家“瀛寰大舞台”，于是原有的各个茶园，也顺应时尚，相继改名。抗战前，有的又陆续取名为“戏院”、“剧场”，以迄于今。

1947.9.15—22

注：

①一园大戏院——即今之人民剧场。

重庆有声电影之初

重庆最早出现活动电影至今已四十多年了。第一次放映，是在清光绪三十一年（乙巳岁，即一九〇五年）腊月中旬，有一个希腊国籍的人，名叫赫德威，用手提式小型放映机和一台手摇发电机，放映了几盘捉强盗、打酒店的滑稽影片。

放映的地点，在桂花街五世同堂周家院内（现中华路青年馆[①]所在地），门票是竹牌子，正式售票入场观看。当时是新玩意，进去看过的人，都感到玄妙莫测。有的人在放映时特地私自揭起白布幕的一角，偷看后面有无舞台人物活动；有的则目不转睛地注视放映机；甚至有不少人坚持认为“这是洋人的一种妖魔法术，摄魂取影”，可见当时一般人思想之简单了。

至于有声电影在重庆演出，已在一九二〇年之后。此时已有了正式的影剧院，电影摄制技术、故事内容都大有进步；而且也有了国产影片，如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电影部，自产影片（由任彭年导演，任系明星影片公司女明星邬丽珠的丈夫）有汪福庆等演出的《孝妇羹》，以及《好兄弟》等，并运来

重庆放映。

有声电影第一次上映，是在重庆基督教青年会的电影部内，时间一九二五年（乙丑岁）八月，临近中秋节。青年会的地址，尚在陕西街万寿宫江西会馆内。总干事是一名外国人，叫谢安道。此人在四川多年，讲得一口道地华语，听来完全是本地口音，办事手腕老练。那时青年会在重庆成立不久，内设好几个部门，活动开展得很快。每星期二、六两晚放映电影，也正式售票。影片内容为宗教宣传。因是新玩意，观者踊跃，每当映期，十分拥挤。

在这以前，报纸上已刊载有声电影的消息，上海也公映了有声故事影片，但并不普遍。即在上海，也只有几家阔气的首轮影院，如静安寺路的“大光明”，福熙路的“南京”，霞飞路的“国泰”等，而且都是外国片。

就在这年中秋节前，青年会贴出告白，刊登广告，宣布放映有声电影。这一新事物的出现，轰动了全城，许多人都要前去观赏。放映地点和时间，作了改变，特在网球场用竹席搭起一座棚子，可容百多人，因为声音不大，每次不能接待太多的观众。

每天早午晚放映三场，从中午十二点开始，票价则比平常高出一倍。至于影片，则并非故事，也不是西方影片，而是蒋委员长（当时称蒋总裁）在南京阅兵时的情形。所谓有声，不过演讲时录音播出而已。声音既然很低，形象也较暗淡，自然引不起一般人的兴致，因此观看过的人，对有声片并不表示好感。前后放映了将近十天，便宣告停映，片子

也送到成都去映出了。

过了两年，小梁子木牌坊的新川电影院开幕（民国十六年元旦新修房屋，称为“重庆电影院”，为蓝文彬、李卓堂合资开办，这是重庆最完善的一所影院，但不过三个月，便失火烧毁，由蓝文彬等另建“新川电影院”）。放映的第一部影片是上海明星影片公司摄制的《啼笑姻缘》，在后几集里，影院便自备有声放映机。这部影片并非全部有声，只在每一集中，夹上两盘有声片，但声音已较清晰，剧中人也用国语对白，开关门户、倒水的声响，都能听明，这使观众大为满意。《啼笑姻缘》本来卖座不错，观者很多，加上有声，更加轰动一时了。

至于彩色影片首次在重庆映出，也是在这一时期。本来着色影片来渝甚早，远在二十年代，各剧团在舞台演出结束之后，便接着放活动电影半小时，其中一半是幻灯片。影片内容，大半为风景、名胜、风俗民情，以及盛大的出殡仪仗、阅兵等等，全系外国摄制，其中偶尔有彩色的，看来十分悦目。

正式上映彩色影片是一九二四年（甲子岁），商业场“环球电影院”开业之后，片名《都珊公主钟情记》，是《天方夜谈》里的一个故事，这部片子从“环球”开幕之时即行预告，每场均用玻板宣传，结果在一年以后才上演，情况胜过一切影片。记得当时票价比平常高出两倍（包厢一元五角，堂座一元），连映十多天不衰。

国产彩色片也是在《啼笑姻缘》的后一部中，夹上有声

有色；可是色彩不及外国片鲜艳，不过在当时，国产片能做到这一点，已经不错了。

在"环球"上映的影片中，有一部明星公司的《火烧红莲寺》，其中"红姑"一角，由著名演员胡蝶扮演，每次出现都着了红色，一望而知是着色的照像色，并非自然摄成。

"新川电影院"是重庆最早自备有声放映设备、最早放映有声故事片的一家影院，主持人是胡伯厚。继后夏云瑚、沈先培等主办的"国泰电影院"开业，有声片已经普遍了。现在彩色、五彩、七彩、立体等影片已臻普及，国产影片也大有进步，非昔日可比了。

1947.8.31—9.1《重庆夜报》

注：

①青年馆——即今实验剧场。

重庆的第一次运动会

一九三七年三月，重庆举行第一次运动会。会址设在沙坪坝重庆大学校园内的运动场，总裁判是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。会期五天，本市各大中学校都参加，情况很热烈，运动员（即选手）们竞争十分激烈，前往参观的人很多。

从那以后，每三年举行一次，地址仍在重大体育场。人们普遍认为重庆的运动会历史，应从那次算起。

其实认真考察起来，全市性的运动会，可以这么算，但若说是“最早”的运动会，应该还有比这更早的了。

最早在重庆举行运动会，是在一九二四年（甲子岁，亦即民国十三年)的二月上旬，地址在临江门外大溪沟的孤儿院操场。会期是三天，所有巴县、江北、南岸的中小学校，一律参加（当时尚无大学）。那是重庆真正的第一次运动会，(在此以前，只有各校自办的运动会）所以举行期间，前往参观的人，摩肩接踵。运动场四周并无看台，观众自带木椅板凳，附近居民还趁此机会出租椅凳。

孤儿院在大溪沟与观音岩之间，接近临华街网球场，为

基督教会的刘子如等所举办。那时距城内较近的操场，只有这里比较宽大，虽然郊区公路尚未修筑，七星岗、通远门外还是一片旷野坟山，但比“求精学校”的球场，要近便一些，交通也比较方便，可以由临江门乘船前往，故选定在此处举行。

以往的重庆足球比赛，多在星期六中午，在求精学校或孤儿院操场举行。这一次运动会，是由各中小学联合发起，巴县县政府的教育局参与组织；评判人员由各学校校长共同审核，教育局派员监督，所以并无主席等名义，当然更不需设主席台了。

竞赛项目，一有田径（当时称“竞走”、“赛跑”）、哑铃、木棍、球类，还有拳术，团体操、跳舞、耍刀等项，可谓竞赛与表演混合。例如那时江北毗罗寺县立女子学校，集体表演单刀；省立二女师的学生，头戴花圈，身穿彩衣，表演集体歌舞等。

各校每天到场，都是整队而来，前面由锣鼓号笛，奏乐为导，很令人振奋。场内布置较为简单，四周由各校学生坐地为界，普通观众，只能在这个界线的外围观看。那时体育运动的空气，不如现在浓厚，许多人观看的目的，也出于新奇和赶热闹。

当时还不兴“啦啦队”，每一个项目结束，全场照例鼓掌一次，并不很注重选手的成绩，没有纪录，也就不存在什么打破纪录了。

但是这次运动会中有一件事，却值得一记。因为以前没

有过，后来也未再见。当时南岸龙门浩，王家沱一带，停泊有美、英、法、日等外国兵舰数艘，其中两艘美国兵舰，一叫“威金”，一名“体尔”，水兵逢周末上岸，在曾家岩求精学校内，与本地的球队比赛足球。这次运动会，便约请参加表演赛。因此，三天会期中，每天都有外国人来参观，还柬请了各国驻渝领事。哪知有两个美国水兵，穿着特制的彩色衣服，脸上涂了花纹，头戴奇形帽子，打扮得象马戏团的丑角一样，也来到会场，做出种种滑稽举动，引人发笑，时而在观众之后，忽而又参入竞赛之中，斜倒纵跳，乱喝怪叫，把全场的人，吸引来注意这两个丑角。三天会期中，每天上午即来，午后散会始去，来去都坐四人大轿，在途中也表现各种丑态。这种情况，在其它运动会中，不曾见过。贺兮讽兮，荣兮辱兮，国人自知。想必这也是欧美运动会中西人的一种风俗罢！

1947.8.9《重庆夜报》

重庆的第一家广告社

随着现代化商业的发展，广告事业也应运而生，同时广告也促进了商业发展，其作用不可低估。现在不少公司行号专门成立了广告部，宣传业务与产品；有的学校亦设立专科，培养人才，商界于广告的开支，也越益浩大。以重庆而言，大小商家，都以广告为招徕，花样翻新，巧妙百出，并争相罗致广告人才。应时而开业的大小广告社也为数不少，交易之巨更不待言了。

重庆最早开设广告社为商业服务，是在一九二六年。第一家广告社，在那年春季开业，创办人为蒲丁侠、尚仙白两人，他们都是研究美术的。蒲丁侠是成都人，曾在华西大学肄业，学过西洋画及水彩写生等。高仙白系涪陵人，国画家，兼工书法。两人都是重庆商界组织的“商业互助社”社员，可惜都在一九三〇年左右，先后因病去世。

这第一家广告社，原为“商余公司”的广告部，并不对外接受业务；商余公司为重庆最早的新型百货公司之一。后因商界其它行号一再要求延请帮忙，同时也顺应形势需要，

便正式对外营业，招牌就叫做“美术广告社”。

蒲丁侠由成都来渝，是因为基督教青年会由成都发展至重庆；他是会里的干事之一，随同来渝主持会内的美术活动，便有机会接触各界，认识了许多本地人士。后来加入了商余互助社，与商界中人往来就更密切了。

一九二六年，商余公司开业，这是重庆首创的现代商业企业——百货商店，特设广告部为其宣传。公司经理黎豁生，专门带领蒲丁侠到上海去，观摩永安、新新、先施等大百货公司的布置陈设和宣传设计。商余公司是以当时的新式为标准，从橱窗美化、内部设备、商品陈列，以及包装捆扎，都讲求时新。蒲丁侠便从此离开青年会，全力以赴，悉心研究商业美术了。

商余公司后来还出版一种周刊，名叫“商余”，内容着重商品介绍，亦即广告宣传，用粉红道林纸精印，每期出版八开一张，附有漫画，由蒲丁侠等绘制；这也是重庆最早的漫画。高仙白为一年事较高的旧学先生，对于国画和书法，异常精通。原在本籍涪陵开设书店，为人忠诚，富于情感，后来到了重庆，因他的弟弟是基督徒，经其介绍与蒲丁侠相识，又经蒲的介绍，成为商余互助社社员。

蒲丁侠长于绘画，再配合高仙白的书法，自然相得益彰。及后，正式成立“美术广告社”，也系二人合作。地址设在陕西街，商余互助社二楼，所有对外一切交际接洽，承揽业务和布置，都由蒲丁侠独立负责。

当时重庆商业界，已经竞相采用广告宣传开展业务，不

过大都是在门市上运用，并且以百货业为主。广告的种类也少，报纸广告、街头墙壁的大幅广告画等，都很少见到。主要的作法，仍是在店铺门前和内部张贴告白。成立广告社后，便可代办电影院的幻灯玻版宣传、橱窗陈列布置了。

告白式的旧贴广告，用彩色绘制，多为对开纸。"美术广告社"成立后，业务很发达，蒲、高两人，相当忙碌辛苦。于是接着便有人相继组织广告社，其业务范围、广告种类、宣传方式、绘画技巧等，也不断创新。随着抗战发生，重庆作为陪都，不少工商业内迁，广告事业也日臻发达了，不但有美术师同人合组的小型广告社，更有了规模较大的广告公司。

蒲、高两人都患有病，身体瘦弱。高仙白因肺结核于一九二八年去世，次年蒲丁侠亦因肺病死于宽仁医院。二人身后都很萧条，一样的遗下寡妇孤儿，情况十分凄惨。现在广告业在重庆日趋兴旺发展，这两人的开创事迹，都堪留记永志的。

1947.9.26—28《重庆夜报》

记梅花少女歌舞团

民国十一、二年间，国内正流行黎锦辉所谱的歌曲，如《毛毛雨》、《麻雀与小孩》、《葡萄仙子》、《可怜的秋香》、《月明之夜》，以及《小小画家》、《三蝴蝶》等等。不但学校列为音乐教材，正式授课，许多家庭，男女老少，也顺口朗唱。同时，歌舞剧团也应运而出，为适合一般之爱好，投顺环境的需要，最初出现于十里洋场的上海。创兴最早的，为"梅花少女歌舞团"。一经表演，风靡锐行，莫不趋之若惊，赏之习之，风头十足，成为一时的新奇事业。

主持梅花少女歌舞团的，为一擅交际的妇女，名叫魏莹波，浙江人，体格高大，面庞宽大，有如男子，既不秀丽，也不娇美，但有办事才能；手段圆滑，着眼于时尚趋好，顺应投机，便组织歌舞团正式公演；更以少女为号召，罗致人才，拥有名姝，以故所事成功，大获效果。最初本在上海立足，后又到苏州、无锡等地演出，名声更著。当时尚无第二个同业与其竞争，故驰誉遐迩，远近闻名。

一九二八年夏，梅花少女歌舞团应邀入川，来重庆表演。

主持此事的，为机房街（今民国路东段）悦和茶园，实则另有特殊人物，具非常之财势，方克罗致。闻最初派人东下接洽，系用川省某将军名义，担负来往全部交通费用，并保证营业收入。这位将军爱好逸乐，久著盛名，新奇玩意，一经顾爱，便亲自领略，耗费巨资也在所不惜。

梅花少女歌舞团在重庆悦和茶园演出，此处原属重庆戏院之一，民初建成，先后有各种游艺团体来此表演。歌舞团尚未到达，消息已传遍渝城，市民早见申报平时载文，极为关注。当时的歌舞，只在大小男女学校流行，每遇集会才演出，虽只有风琴伴奏，一两对青年简单化妆，动作也很单调，但已足以轰传巴渝，踊往观看。此次既闻大型专业歌舞团来渝，更加引动市民，必欲争先一睹。

该团到渝后，住在中央公园对面的中央旅馆，有男女演员五、六十人。演出之前，由主持者具柬招待各界相见，设宴于公园内靠南的“涨秋山馆”，当时该馆正经营西菜，往来其间皆属特殊人物。

到期，所订时间为午后六时，尚未入晚，已宾客满座。团主魏萤波便率领全体男女演员到来。少女演员均作白衫黑裙的学生装，男演员则为西服。

宴后即举行招待演出，地点在楼下大厅，先唱《总理纪念歌》、跳《水手舞》，然后是黄昏与徐綵莺两人合跳“探戈”，后则演出《麻雀与小孩》。此剧演员三人，大麻雀为张仙琳饰，小孩为龚秋霞饰，且歌且舞，十分精彩，窗户外也挤满人群，大有推倒门户之概。此一盛会，实开涂山字水间娱乐之新纪

元。

渝城各报，亦争先报导。最出力者，为每日下午发行之夜报《东方晚报》，主持其事者，为刘玉声。该报系四开版，印刷精美，为重庆发刊之第一家晚报，并首用红色套印。

自四月至八月，盛况空前，演员阵容也齐，有龚秋霞（号称影界四姊妹），徐粲莺、笑博士张绮，清唱张仙琳，以及钱钟秀，皮耐秋、蔡一鸣、翁兰魂等，年龄都不过十七八岁。再者有严月凡，为新派画家。原在中华书局，为《儿童画刊》及《小朋友》绘制封面插图。

歌舞团在重庆演出数月，卖座甚佳。这算是山城最早看到的现代舞蹈演出了。

1948.8.21—27《重庆夜报》

重庆长篇小说溯源

三十多年来，中国新闻报纸的版面形式，无甚变化，均以文艺为副刊，占据一个版面，成为一个重要组成部分。长篇连载小说，为副刊内容之一，不可或缺。号称全国文化中心的上海各报也不例外。如新闻报副刊《快活林》，连载《啼笑姻缘》(张恨水著)，申报副刊《自由谈》的《人间地狱》(婆娑生即毕倚虹著)等。

重庆自清光绪三十一年(一九〇五年)创办报纸以来，至今已有四十多年历史了。当时的社会风气、文化等，与现今不同。至于长篇小说的出现，作为地方史实，有追溯之必要，也算是重庆新闻事业的历史，本地报刊沿革的掌故。

第一份在重庆出版的报纸，名叫《重庆商报》，系本地几位文士绅衿所筹办。社址在小梁子五公馆内，即现在大华饭店所在，每日发行对开一大张。约在两年之后，便进行改组，正式作为重庆商会的出版物，报名上加了一个字，为“重庆商务报”，社址迁到下城县庙街中段二府衙巷内，即后来的巴县文献委员会院内。文献委员会是编撰巴县地方史

《巴县志》的机关，由政府管理资料搜集。

重庆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应推《重庆社会现形记》。因内容触及商界，受到重庆商会的干预。报纸的生命，系于商会，对于商会停止刊登的意见，自然必须遵照办理。《重庆社会现形记》一文，先后发表三个月，共四五万言。此一长篇小说，读者印象很深，开创了渝城报纸版面的新纪元。

《重庆社会现形记》的作者田书府，仍继续在报馆任编辑，后曾一度任总编，可惜身体瘦弱，于民国十二年（一九二三年）因病去世，尚未到三十岁。

民国九年，重庆市面上，售卖一种小册子，书名《粉江繁笔记》，系用有光纸单面石印，对摺装订。书长四寸多，封面用红色彩纸，装帧触目。内容是一篇小说，约万多字，影射当时名人名妓，是用白话写成，未分章节，内容虽然不恶，但未免浅薄流俗。这书作者署的别名，实为本城王超常著。此人常去青楼，故将见闻写成小说，自行出资印刷。民国十年（一九二一年）还曾与刘涛公合办《鸿鸣日刊》（由新蜀报印刷所印，该所当时由宋南轩主持，地址在现今道门口银行公会内），仅半月后便停刊，王超常不久也病死了。

《粉江繁笔记》可算重庆出版的第二部长篇小说，虽未在报刊上连载，但背景人物均取重庆，曾引起许多读者注意，流传颇广。

民国十五年以后，重庆新闻事业大有进步，先后出版的大小报纸有数十种。晨报、午报、晚报俱全，内容、版面也日益革新，对副刊更加注重，大非过去简陋可比，只是长篇

小说却很缺少，既无专门作者，报刊也未重视。

当时本地唯一的夜报《重庆晚报》，是销行最多的。社长赖建君，总编龚永陶，颇能努力进取；第四版的副刊，所载多系短小精悍的诸趣文章，最受读者欢迎；其报纸的生命，则寄托于副刊中的一个连载小说上。

这一部长篇小说，名叫《如此江州》。著者署名“然然”，内容以重庆中、下层社会为背景，描写当时的诸般罪恶，揭露种种黑幕，取材广泛，描写细致，文中所写地点、商号，均用影射或谐名，使读者一看便知。如永令巷，日本餐馆兼娼寮“又来馆”，则改称“再来馆”，商业场的台基旅社“大中华”则更名为“小支那”。

《如此江州》是一部警世小说。重庆晚报特辟专栏，木刻题名，按日连载，分段而不用章回，能适合一般中、下层市民的爱好，报纸销路因而大增。

这篇小说连载两年之久，因作者离渝去沪，方告终止。先后三十多万言，后曾由永兴隆商号出面，印成专著发行，由上海印书馆印刷。但在每一页上，都附印一条广告，为此，作者与出版者一度发生纠纷。

民国十七年夏，重庆《东方晚报》出版，四开，在一版上曾连载《如此江州》第二集，排成三十二开书形，便于读者剪辑。但三个月后报纸停刊，该文又告终止。民国二十四年，商务日报改组，由王岳生、赖健君等接办，每日发行对开三大张半，其中一张半为副刊，题名“本地风光”，又有名《江州外史》发表，作者仍为“然然”，内容接《如此江州》，写作

技巧和内容，较一、二两集为佳。一年之后，商务日报又改组，接着抗战发生，纸张困难，各报紧缩篇幅，发行联合版，长篇小说就告停止。

十几年后之今日，重庆报刊的长篇小说，已有多种，尤为晚报注重，作者也多起来了，但回溯初期，不过以上三种而已。

1947.3.17—22《重庆夜报》

男女杂坐之始

早年，公共娱乐场所，男女是不能混合杂坐的，例如各处会馆神庙出演戏文，正殿之外，左右则配有苏楼，系为一般首士会众眷属观看之所。如普通妇女前来看戏，都是在苏楼之下，或戏场左右，自带条凳，与男人互相隔离，各有界线。

清朝光绪三十一年（公元一九〇五年），重庆举行赛宝会，会场设在今莱元坝河岸，场内创设梨园；此乃重庆开设戏馆之始。虽然男女都可前往看戏，但周围建有环楼，乃专为女宾准备的座位。此后，城内正式有梅子坡的“萃芳茶园”，余家巷的“同乐茶园”，白象街的“大观茶园”，机房街的“悦和茶园”开幕，都是特别修建的房屋，也照例辟为环楼，售卖女宾票，而且男女进出口分开，距离较远，方向各殊，毫勿紊乱。

以前戏园每日照例发戏报一页，大小如现在的八开报纸，用有光纸印刷，木印或石印，多用红黑二色，上面详列当日午、夜台剧目，以及演员名字，清晨由专人散贴。在民

国四、五年间，戏园常起争端，打架斗殴；治安当局曾一再严办，且将肇事者就戏园门外砍头示众，仍难制止，而出事又多在夜间；故各家茶园的戏报上，还印上“午台男女合观，夜台专售男票”等字。至于男女杂坐之事，那简直是有干法纪的行为。

到了民国九、十年间（即公元一九二〇年左右），重庆已有电影院出现，地点则多租借戏园改演。男女看客，仍是依着习惯，不能混合杂坐。后来中陕西街（今陕西路）万寿宫内的基督教青年会，每逢星期二、六，放映电影（重庆青年会最初成立于此，由外国人谢安道主持，后来才迁至大梁子公园路，并自建房屋）；所有影片，大多是宣传宗教，但为营业性质，收费很低；男女均可参观，地点则在大礼堂内，虽无楼堂之别，但女宾座位则在靠左一角，用布围着，以示隔离。不久，几位留法学生回到重庆，在打铁街新华茶楼开设“智育电影院”，虽系一幅平楼，也曾用木板隔别前后，分售男女宾票。

直到民国十四年（公元一九二五年）三月，成都人吴特生由法国归来，特在重庆开办“寰球电影院”，创设家庭包厢，才算破天荒地有了男女杂坐。

“寰球电影院”并不是重庆第一家放映电影的娱乐场，在此之前，已有余质彬（四川军官余际唐之族弟）开办的“光明电影院”，地址也在“寰球电影院”原处。至于第一家电影院，乃是民国八年（公元一九一九年）元旦日开幕的“涵虚电影场”，地点在木匠街“宜春茶园”内，即今字水街

朝天驿左侧，系浙江人陶义文所办。不过以往皆是因地制宜，利用现成场地，“寰球电影院”则一切按照放映电影的要求而布置。

吴特生是四川成都人，为早年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。一九二五年返国回川，便在重庆开设“寰球电影院”，租借商业场“东舞台”为院址，此处原为“裕民社”演出川剧之所，内部宽阔，适当商业地区。吴特生对于电影业务，颇善经营，所有布置设备，均非重庆其它电影场可比。院内环楼，仍系依照男女分座，但是特将二楼正对银幕的居中一部分接出扩充，用木栏分隔为大小十八间，每间安置坐椅十座、八座、六座不等，取名叫“家庭包厢”；凡包订一间者，即可男女混合杂座，此系便于家庭合观，不致分散，名正言顺，竟告实行了。

这一新的名目，实际开创了重庆娱乐场所男女杂座之始。当时竟能实行无阻，却也有原因。“寰球电影院”虽是吴特生主持，但系股份组织，而股东人数不多，且为当时军政权要，如省长赖心辉、省府秘书长沈乐丰等，均有关系。每场持有武装兵一排开来维持秩序，护守内外，院方又曾向法国驻重庆领事馆注册，标挂蓝白红的法国旗帜，并用法商的题记；还找了一个名叫杜尔布的法国人来当总经理。其实并无别的作用，只是每场佩带手枪，站在门外，用大鼻子来威镇一下，然而竟生了效果，秩序很好。

家庭包厢，原系便利观众一家合坐欣赏电影，但后来由于营业之故，便可单独分售包厢票，只要谁买了包厢票，不

分男女，也不问是否一家人，便可进入包厢，杂坐一起。“万事开头难”，这一风气“多见不惊”，渐渐习惯，继后梅子坡的“联星电影院”，木牌坊的“重庆电影院”等，也照例辟出包厢，接着其它川戏院、京剧场也跟着照办，男女杂坐更是无所谓了。

1947.7.23《重庆夜报》

渝城四大名家

重庆臻于繁荣，至今尚不到三百年。正当明末清初之际，扬子、嘉陵两江围护的山城，还是一片荒芜，只有近河岸一带有宅院商肆。崇祯末季，张献忠入川，渝城遭受战乱，几乎烟户灭绝。后来幸得四大名家的开业兴基，方才渐渐地复兴。

所谓四大名家，系王、简、蹇、黎四大巨室。他们都是具有官阶，享有隆重恩赐，在渝城各据一方，平分春色的。那时是插筶为业，深恐无人肯来居荒，所以四大巨室任意扩充面积，施展圈划手段，多多益善，有谁来加以限制呢？

最有名的是王应雄，他在明朝崇祯年间，官居大将军之职，屏守江州一带，可说是在渝城修房造屋最多，尽情享图安乐的一人。他的府馆别墅都在下城沿江一带，与市场相接，一切布置受用，穷奢极侈。也许他忘记自己是受命守土，竟然作私有子孙之计。因此，便给御史参奏，调京陛见，预料结果凶多吉少。哪知正当其时，张献忠率部迫近江巴，警报飞传，朝廷只好派他返回四川剿灭。王应雄驾轻就熟，得地

利之便，迭次告捷。这一来，他自然功高恩渥，视重庆为本土，广事插笘，大兴建筑。清兵入关，大明失统，他就在重庆作起寓公来了，安富尊荣，享乐无穷。他的本府在现今的龙王庙治平寺一带。药王庙原系古西湖池，也一度辟作王府园林沼塘，相传王应雄曾与张献忠所部在城内大战数日，双方死伤无算，所有遗尸全部抛入西湖池内，故又有"万人坑"之称。

至于王应雄的地产，更是不可核计。由城至乡，远至永兴场、土主场，可谓百里之内，不履他人地皮。直到清朝乾隆年间，王氏子孙零败，不肖者多，所有产业，陆续荡尽，甚至所住私宅，也变卖出售，变为治平寺、罗汉寺了。

其次是简天官，姓简名毅。他是奉旨退休，在重庆颐养晚年。但是他的后辈，却代有官职，继承俸禄。其住址在重庆靠西一带，府第广大，也大肆扩充园林作为私人游息之所，其面积上达七星岗，左右至会府、莲花池、德兴里一带，所有田地均属于他所有，其财势略亚于王应雄。

第三家为黎氏，名修惠，官居兵部侍郎。明末，与王应雄同奉廷召，剿灭张献忠，因有功勋，便在渝城营谋基础。他的子孙最多，不少担任了清朝的官吏。黎修惠的府第在下城近河一带，即今望龙门白象街、中央公园等处。屋宇堂煌，讲究轮奂之美，与王、简二家广事占有略为不同。

此外，还有一个蹇进贤，也是天官告老退休。他的故址，今日实亡而名存，就是马蹄街上面的天官府。蹇天官的作为，又与前三家不同。他虽有高位显爵，居住渝城时，年岁

已高，并不重荣耀威势，却一意在诗词书画方面讲求，专门接纳才人文士，以琴棋酒茶为消闲。他的天官府中，也有亭台楼阁之胜，遍植花草竹木，以清高自命，故名声最大。

这四大名家，都受朝廷恩渥，各自竞谋荣典，先后在城内建立起许多牌坊，一门之中，几乎忠孝节义都有出现。只要他们具报朝廷，便照例有旨褒扬，修建大石牌楼一座。现在林森路中段，一二三四牌坊即是石牌林立，早年便因而命为街名。其实牌坊不仅遍于城内，四大家各于自己地界之内，也建立了不少，至今附近各乡还可寻见；当年，单城内便有四百余座。

渝城四大名家，至今不过三百年左右，早已地异人没，甚至烟祀告绝，以往的盛大丝毫没有痕迹可寻了。民间所谓“千年田地八百主”，确不失为至理名言。

1947.7.12—13《重庆夜报》

午饭时计

现在大多数人都有钟表，公司行号、机关厂家更以时计为作息准则，全国还统一了标准时间。可是在数十年前，重庆只能用“午时炮”的办法统一时间。每天到了正午十二点，便鸣炮一响，远近可闻，告诉大家时间的早迟。

“午时炮”最初在道台衙门外月台坝施放（地址在今莲花街第一模范市场），后来，迁到后伺坡中部土堡上（现公园中山亭处）；再后，又移到南岸玄坛庙旁海关草坪。由每天午时一炮，改为每逢星期六午时施放，作为休假的通知，这已是民国十五、六年间的事了。

清代，重庆道台衙门外面，东南两辕门进口之侧各有楼台一座。每天早、午、晚，有乐工在上面三吹三奏，这成了一般人早、午、晚三个时间的标准，很多人便以这三吹三奏为一日三餐的时计。再推溯回去，则有“老鼓楼”的“铜壶滴漏台”，地在西四街口下首，民国十九年才拆除。

在清光绪中叶，时钟虽已流行，但并不普遍。渝城只有少数达官富绅家中备有大自鸣钟及怀表，时间标准也不一致；

还有更多的人以日出、日斜、日落为起居的依据。可是那时重庆市上，竟有一个“午饭时计”，乃是太平门顺城街云南帮经营汇兑业务的“天顺祥”商号所使然，该号有个白案厨师夏师傅，他成了下半城一带地方活动的午饭时计标厨。

“天顺祥”的主人叫李耀廷，与江西帮的“萧怡丰”同为渝城两大票号，营业范围很广，往来多系达官显贵。商号内供应奢华，对饮食异常考究。每天除正常三餐规格形同筵席外，中午时分还要开一道点心，厨房中聘有红、白两案准师多人。

老夏是“天顺祥”白案掌脉师傅，专门制做各种点心，手艺高超，在同行中很有名气，据说他可以做出二百多个不同的花色品种。

光绪三年，丁宝桢出任四川总督，次年到重庆阅兵，到达那天，首先到“天顺祥”拜望李耀廷。行客拜座客，这是极少有的荣幸。丁宫保的官舟泊在太平门，由船上抬往“天顺祥”的课银达数万两。“天顺祥”的名声因此更传遍全川。原来丁宝桢是贵州人，未做官以前，在云南期间，李耀廷多次接济过他的活动经费，二人有一番私谊。丁宝桢后来荣显了，又适来四川，感激故旧，便于入城后先行拜望李家商号，谢往年资助之力。这对于以后“天顺祥”的业务开展和信用上，当然起了非凡的作用，时至今日，还为一般人所称道。

丁宫保往拜李耀廷那天，是临时去的，并未预先知照，“天顺祥”毫无准备，供应接待，一应俱无。时间正在中午，恰值号上开点心之际。当天传出的种类，名叫“四季花”，

即一包、一饺、一烧卖、一荷叶卷，共两甜两咸。虽有上宾降临，也只好将就这一品种端进客厅。李耀廷很觉过意不去，连连表示“宫保驾临，未克准备，只好用小记常点敬奉”。哪知丁宝桢吃了之后，反而盛赞制作极佳，很合口味；还说打算再来一份。这真出乎主人意料之外，高兴极了。事后，李耀廷将老夏每月工资二两之外，特别另加一两银子。

老夏经此一事，名气更大了。他居家萧家凉亭上面，靠近长安寺，自备有小黑驹一匹；每天将近中午，便骑着小马，由家里到号上做工。他由家里到太平门，要经过好几条街，时间很准，从无延误；沿途人家每天只须瞧见老夏骑马经过，便知时已近午，准备吃中午饭了，所以人称他为活的“午饭时计”。

1947.8.24《重庆夜报》

郭志达三任巴县

清光绪七年，郭志达首任重庆府巴县正堂，为政清廉，深受人民拥戴，有干吏的称号。光绪十六年，第二次又复任巴县，这是没有前例的，即使后来，也没有再见有哪位知县复任。到了光绪二十一年，他竟又第三次复任巴县，这真可算空前绝后，不但任中能获民心，上级也很器重。

对郭志达，人们褒贬各半，有人指他不免贪吝，也有人认为清明；事后追忆，该人确非驽才。然而既跻身仕途为官，利禄观念何尝没有？只是要钱自要钱，作事自作事，与一般贪鄙的污吏大不相同，也就在此。可是三任巴县之后，调去内江知县，不到四月便去世了。身后萧条，重庆方面，尚有哀启张报，由各方惠赠奠仪，方克治理丧事，棺殓成礼。从这点看来，也就不难想见干吏虽有能为，其死时又是如何？

关于郭志达在巴县任内，政绩颇为不少，这里举两件事，对其能力和作风也可见一斑了。

他是一位会弄钱的亲民之官，但是要弄的对象，却非普通百姓，且须取之有道。尤其是不务细微，遭他敲索者，也

能甘心奉献，不致含恨.反而要感谢他的庇护;这是很不容易的手法。巴县龙岗乡有一个姓杨的孝廉，本是当地富绅，田多宅广，后来又中了举人，更是得意忘形，大事扩建屋宇，宴请宾客。他的座宅前后数进，由正门入内直达厅堂，有个长方形的大天井坝，两旁环立朱漆万字廊栏，正中的大厅，有丈多长的屋檐，定烧的琉璃瓦镶盖，檐口朱漆横梁，伸出瓦桷一列，与左右两厢连接，瓦桷全系圆木，尽用光漆。伸出的檐口，则雕成盘龙图案，一律贴金，辉煌美观，富丽不下王府。杨举人自以为增光凑华，不料此事竟被郭志达知道了；真是一个绝好的敲取机会。他于是特地发下牌报，作一次巡行，率领巴县正堂衙门全部仪仗差队，渡江到达南岸，顺着各乡场镇，直到龙岗。知县大人未至之前，先已有公差在前面照会各乡场镇的首人绅士，例须迎候接待。龙岗乡的杨举人，为了表示恭维起见，特地准备于郭志达到乡之后，在他的座宅里设宴奉请。哪知郭志达到乡之日，竟先行直到杨宅，名为拜会。杨举人没有料到，更不知其中另有意图，反而引以为荣，知县大人的仪仗到了门口，赶忙亲出迎接。

郭志达在大门下轿之后，与杨举人并肩入内，漫步参观，盛赞这屋舍精美华丽，杨举人内心很觉得意。后来行至正厅檐下，郭志达停步细看，忽然大惊，说道：“想不到本县到府上来，恍若置身金銮丹墀，孝廉公真是洪福照临了呀!”杨举人陡然听了这话，虽然感到诧异，但却莫明其妙，瞠目问道：“县台是何言耶?”郭志达便抬头指着檐口圆木上面雕绘的团龙描金图案，说道：“这不是宫殿的制纹吗？非帝王哪

能有这种装饰图案？"在封建时代，品级享受，图纹穿戴，非同小可，可能涉及叛逆之罪，早吓得他惊魂千里。当着本县命官在此，又系亲自目睹，倘若报告上宪，呈奏朝廷，那还了得？立即双膝下跪，叩求宽恕，并恳请隐情救助。这一来，正中郭志达的心怀，不用说，乘势敲取，满足所欲而后已。就这一事，便可想见他的手段超乎寻常。可是他三任巴县，均能深得民心，一般平民都不以其贪鄙而致悲愤，也自有原因。

他的另一作风，是对于民间的事件，能出以明快奇妙的处理，当机立断，勿论门户，一经承询，只要是公开昭明的问题，不管如何严重，总可以大事化小，小事化无。所以民间交加颂扬，互获安宁，这便是他手法高明之处。

光绪十六年，第二任巴县时，正值本城柴家巷巨室刘道台家，发生打死厨工、引起全县佣工轰闹暴动一案。对于这事，他应付处理得极为巧妙，竟使原、被两告认服，一场大的风波，才告平息。

柴家巷刘姓，系本城巨家富室，座宅很大，后面与都邮街董家公馆（今新生市场）相接，正面与周员外（今青年路、望衡对宇，即现在国泰电影院所在之处。这一地产，也系刘氏卖出。当时弟兄数人，称渝城宦门。刘氏名兆麟，字秉钧，兄为遂宁乐官，弟系顺庆学官。刘兆麟曾捐了一个贵州道台，因禀见之费不足，长期候缺在家。他先后用了四万多两银子。这笔数目，在当时已经大得惊人了，还是无法疏通，便失望返家。

刘氏养尊处优，极力讲究官场排调，雇有专门厨师治理

三餐两点。有天夜晚，召厨师到内厅吩咐次日菜单，并指点当日失误。厨师申辩，言语顶撞，刘某当时正躺在床上吞云吐雾，闻言大怒，认为这是以下犯上，顺手拿起手中烟枪打去，正中厨师头部，当时便气绝身死。

厨师的家属闻讯由乡间赶来，当然不依。消息传出，全城佣工愤愤不平，相约齐集刘家门前，计有数百人之多。众怒难平，一时街巷为之涌塞。专制时代，这是少有的现象，刘氏惊惶无措，急奔巴县衙门求告。

这是地方职责所在。当时的步班头脑萧二麻子颇有才干，为上官所倚重，郭志达便召萧商量办法，决定先派步班二十余名，武装（羊角叉、春秋刀、蛇矛、梭标等）前往刘宅，由后门悄然而入。正值前门哄闹之际，萧率同步勇，猛然由内冲出，大声宣布："大人已到了，正要捉拿为首的流神痞子，你们还不快走呀！"拥挤的人们，因无领头组织，经此威吓，便纷纷散去。郭志达随后赶来，对厨师家属先行慰问一番，然后劝双方和解，由刘家出银一千两作为抚恤。乡下人迫于威势，只好答应下来，领尸掩埋，还遵照郭志达私下的嘱咐，自认死者有冒犯主人之处，方才激起愤怒，酿成死亡，尸亲既然不愿诉之于官，众人也就不好再论是非，于是一场风波，便告平息。由此可见郭志达的手腕了。

1947.7.19—21《重庆夜报》

耿巴县(耿公达轶事)

清光绪三十二年，署理巴县正堂的耿公达，字保奎，为人直爽，操政精能，有干吏之称。在任两年多，政绩颇多，百姓敬畏，豪绅收敛，众人送他一个"耿巴县"的诨号。他在巴县任内的许多事迹，在民间有故事传述，但也有人评论他太专横，说他是酷吏。在传叙中，有的人把"耿巴县"误为耿鹤皋，把两人的事迹混为一谈。其实耿鹤皋不是县令，而是重庆知府。此人亦称干吏，但贪鄙狡猾，曾因涉案解往成都受审，与耿公达"耿巴县"风马牛不相及。

"耿巴县"对于地方治安，异常重视，每遇盗窃案件，捕获的人犯审问之后，按例要给予惩罚，他却别出心裁，另用一法。据说，他用肥肉熬成油汁，不放任何佐料，用瓦钵装好，差役将盗贼的发辫高悬在堂口旁边柱头铁环上，使犯人仅两脚趾尖落地，脚底斜立，命犯人两手捧滚热的肥肉油汁急喝，脚下则用铁爪轻搔脚板心，使其口中吞下油汁，腻人五脏六腑，油气直冲顶门，而脚下又奇痒难熬，又哭又笑。

当时用此法惩治盗贼，地方竟获安靖。

耿公达平时很爱改换装束，扮着普通百姓模样，游逛街市，了解民情，遇有不法无理的，便出面取缔干涉。有一次，他行经过街楼附近，见三重土地侧边一家卖丝烟的店铺门前，坐着个年轻妇女，当街袒胸露乳，哺喂婴儿。这在当时，认为是一种伤风败俗的行为，耿巴县便走上前去关照她不要这样，有伤风化。那妇人不听劝告，反而责问："与你有啥关系？多管闲事！"耿巴县说："谨防遇到耿巴县，要受处罚啊，还是不要触犯为好！"那妇人更气愤的说："耿巴县敢把我做个啥子？老娘喜欢怎样便怎样！"不久，便有差人前来把这个妇人押到巴县衙门，责打四十皮条，罪名是"当街哺乳，不顾羞耻。"第二天，那妇人依然如故，毫不改悔。昨天劝她那人又来警告她："耿巴县如何？你应该早听我的话。"妇人不知这人便是堂堂县令耿公达，竟口出不逊，破口大骂耿巴县凶残。过了不久，又有差人来，将妇人逮往巴县衙门，受责掌嘴六十下，罪名便是"辱骂官府"。妇人这一下痛极了，也知道了耿巴县的厉害。不敢再有触犯。

旧时妇女必须遵守"三从四德"，良家女子，更不得随便抛头露面。大年初三，有妇女前往第一山长安寺、罗汉寺等处烧香拜佛，如系年轻女子，无长辈夫婿携同，而且搽脂染红，招摇过街者，耿巴县便命差人拘来乞丐告化子多人，令他们当众将妇女脸上的胭脂水红，用舌头舔舐干净，然后分别背负背上，送返其家，饬丈夫公婆管教。

当时"耿巴县"之名，真是妇孺皆知，据说有的妇女为

了吓哄孩子，便说："再哭，耿巴县就要来了！"由此可见人们对其印象之深了。

1947.6.11《重庆夜报》

记 保 芝 舫

本地流行着一句歇后语，凡认为所作之事所说之话，多余而罗嗦的，便指是“保大老爷修新城”，意为“格外的圈圈”，即不必要、多此一举的意思。新城在江北县城靠北，就原来的城垣，自西而东，加一幅墙，较县城面积约小三分之一，西与金沙门相接，东迄问津门、东升门之间而止，并在向西向南两方，各开一门，名为“永平门、新城门”。

新城内面，全系田土农户，此外有吕祖庙和火神庙，以及私人园林数处。清朝末年，巴县名人马绍元（即马二老爷）的马家公馆，便是其中之一。民国以来，江北、巴县户口增多，商业日趋繁盛，新城内面的房舍，也陆续建修，孤儿院、治平学校先后成立；抗战时期，迁入的人口越来越多，已成为闹市了。

修建新城的人，都知系保大老爷。他是江北理民府司知，这一建筑，可算他在任“政绩”之一，其人之所以出名，也是由这件事引起。保名芬，字芝舫，满洲镶黄旗籍，与爱新觉罗支系最近，与当时的嘉庆皇帝，是表兄表弟，因情谊深

厚，极受恩宠，故保芝舫也自视高傲不可一世。

嘉庆二年，他受命为重庆二府，接胡二府的后任。二府衙门，在县庙街偏右，即现在望龙门对面，其职权是执掌一切偷盗奸邪、刁拐恶霸等关系地方治安的事件。保芝舫身任二府，算是称职的，却又不满意二府的官卑职小，排场不能称心适意；自已以为出身不同，又系皇亲，便不免任性。然而清朝制度严格，又不敢过份冒渎僭越，因此，他在任的行为，便往往超过范围。

二府照例要每天上府道两衙谒见，所有仪仗，仅能排步到达而已，不能喝道呼衙（旧制知县以上官员出门，有公差喝道，令"蓝帕白帕"揭下来，茶馆酒店坐客起立，候官轿经过)。保二府虽格于规制，却又不甘冷落，他每次上府道衙门去时，一切如仪，但是退后踏出辕门，即开始"喝道"，势态威严，有时行经上司衙前，不便冒制；可是一过仪门，立即依然喝道，一点不肯放松他的排场，所以人们称他为"软进硬出的保二府"。

那时江北为一厅制，设有厅官，直辖于重庆府。江北虽有城垣，可是居民不多，只在靠江一带，略有市街，后面大多是田土荒林，间有几座庙堂而已。居民多以木货、推船为业，所有本地、外籍船户，都聚集北岸；其中有云、开、万、大红旗、荆、襄、辰等帮，彼此为了装运客货，以及其它争执，常起纠纷，甚至引起械斗，江北厅大部分公务都是办理此类事件。

重庆二府（即同知）保芝舫，以皇威自居，于体制多有

冒越，同僚、上司虽不能直接予以弹劾，官场谈论终于上达朝廷，不久便诏命调为江北理民府理事同知。这是人事关系，保芝舫倘若没有那一种特殊的背景，自不可能。朝廷因他既爱理事，才采取了这一照顾性措施，同时又要考虑他现有的品级官阶，所以便特别将江北厅改制为理民府，一方面也是为了避开官场上宪的不满，调他到这里来，可以任其冒越，无人干涉了。

江北县城，范围不大，且因年久失修，颓毁甚多，历届厅吏，本拟兴工培补，重庆府也曾数度禀呈上司，终因库帑有限不敢轻动，地方经费又很不足，迟迟不能批准动工。保芝舫接任江北理民府后，便计划先行培补城垣。他是有钱的，动用点库帑公币谅必没有问题，只是先行预算，禀呈核准，便可正式动工。

可巧，此时江、巴、璧、合等县边境，不但盗匪蜂起，还有大股暴乱骚扰。最有名的是王三槐与李短搭搭两股，以及后来的张大烟杆（又名张瓣子）、谢寡母等支，势力庞大，正散布在合川江北两邑之间的草街子、悦来场、山峡一带；这些原都是翼王石达开在川的旧部，因失统而无法聚集，便小股流动。江北警报频起，火牒累传，保芝舫为确保江北城安全，便决定修建新城。

江北新城，若非保芝舫也许不能成就。他一方面是自己拿出一笔钱来；至于动用库银，在他既为满族，又系皇亲国戚，奏准是有把握的。呈报修建新城，适逢地方不守；名正言顺，所以不久获上司批覆，便动工修建了。

关于重庆二府迁往江北厅，巴渝俚巷间另有一种传说；当然是无稽之谈，但谈论的人很多，这里一并记述。

相传重庆二府迁往江北厅，时在道光初世，渝城有名的一些票号钱庄，相继发生抢案数起，或因库房存款遗失，或者课银被盗，先后具文呈报二府衙门，请察勘缉办。府县两司选派干差前往失窃现场察看盗迹，竟毫无线索可寻，各方下手侦探也没有结果，似成悬案，不能解决。被窃各家虽然接连催请，府县两司只能严饬步差赶速办理，甚至科比从重，仍旧无效；而且窃案仍有发生，以致商界风声鹤唳，市面趋于惶惑不安。当时重庆二府姓金，满族人，系由云南镇雄调来。为了这些巨窃案件，与巴县知县吴鼎，意见不合，颇有龃龉，彼此职责所归，不能旁贷，但金二府以满籍关系，处境特殊，吴鼎则累受责难，很感棘手。

巴县知县衙门步班差房，有教师名邓伟，山东人氏，武功操练有素，除了拳脚之外，还能登墙越壁、高来高去，故巴县知县衙门差房，特请他教练步差公役，传授拳棒刀尺。邓伟每天晚上也就住衙门差房。

一日深夜，已近三更，大街小巷早绝行人。下城比较繁盛市街的两边店铺，门外悬挂的四方白纸檐灯二更以后，也就油尽灯熄。那天正当下旬期间，万星闪烁，黑夜中一片茫茫，山形室影，只能勉强可辨。

邓伟在过街楼朋友处夜饮过迟，这时顺着陕西街经道门口、莲花街，回转巴县衙门。将到县庙街口，这是一个转角路道，左通白象街，右去老鼓楼，他忽然瞧见一条黑影由下

而上，飞登到白象街与县庙街交汇的过街园光门风火墙上去了。这在其他寻常的人，也许还不致注意，可是邓伟眼明机警，身手敏捷，早已看清那黑影是一个人；他想深更半夜，飞墙越屋，绝非善类，必定是盗贼无疑。为了弄个究竟，便决定跟踪前去。

邓伟身上穿的长衣，原已搭在左手腕上，好得正是短挂紧身，便随着攀上墙头，伏在暗处探望。只见那黑影向他这方向迅速奔来，已经距他不过一箭之遥，接着很快便从他旁边过去；邓伟不敢迟缓，暗中跟去。彼此都是好本领，翻墙越屋，全无声息，直追了半条街，看看快到县城隍庙的石垣了，前面黑影似乎发觉后边有人跟着，竟向左折入二府衙门街内，而且脚步加快；后面追来的邓伟，望见黑影加快步子，深恐逃掉，也加快速度，紧追不舍。随即看见那黑影对直跳上二府衙门的院墙，奔向后厅；邓伟发起急来，因为二府衙门内堂舍重重，倘若隐藏起来，不易寻找，况且系官衙所在，深夜又不便惊动衙司，慌忙中，只好下手击打。但是这天出街并未料到要遇见这种意外，随身未带任何器械，急追中，便从衣袋里摸出一枚制钱，对准前面黑影的上三路掷去，打个正着，只听得那黑影“哎哟”一声，由墙上坠了下去。

邓伟伏在墙头，观察了一会，估计黑影已中了他的暗器，坠下之处，正是二府衙门后堂。可是等了好一会，下面并无动静，也不见衙内有人吵嚷。这不禁引起了他的怀疑，赓即退返巴县衙门，把刚才所见的经过，报告差房步班头脑。

在六扇门内找饭吃的人，对于这类事件何等精明？步班

头脑已经猜测到了其中真象，立即进入后衙请见大人，禀报机密。吴鼎当即传入内书房，细问详情，并将邓伟一并传到，共同推测其中隐情：认定二府衙内，必有巨盗潜伏，并且在大人内厅也许就是接近的亲随。至于渝城各票号，先后发生各案，至今悬而未决的，必定与此大有关系，如欲破获，必须从这一线索着手追究。

次日早晨，吴鼎即带领仪仗差队，到二府衙门拜会，具报机密。哪知手本传入，竟给挡驾，回说二府大人有病，不能见客。吴鼎更加怀疑，因为二府同知与地方知县同为亲民之官，几乎每天都要见面，昨天曾经见过，为何今天忽然得了急病？便再三要求会见。内堂忽又传出：大人已回走马街公馆。吴鼎听了，越加不肯放松，立即转赴金二府私邸。

到达大门，传帖入内，金二府不能再拒不相见了，便请在客厅会面，由专役两名，左右搀扶出来，头上缠了重重丝帕，掩至双眉，遮住额部。吴鼎见此已明瞭真情，便告辞回县衙。相传金二府原系关外响马（强盗）之流，自己知道不能再立足下去，便具牒呈禀上宪，申请退休回京。至于吴鼎，回县衙之后，也秘密呈报府道。但是，因为金二府是满族旗人，又系皇亲，府道各官都有顾虑，始终不敢把他怎样，也就不了了之。不久，上宪奉朝廷旨意，便将重庆二府迁往江北。

这不过是一种传说，与二府移往江北厅的真象，并不符合，金二府其人，也并无依据可考。保芝舫的一切事迹，地方县志都有着记载，是有历史依据的。

47.7.7—11《重庆夜报》

王　洋　人

今日风行短服，西装也很普遍，但在三十年前，尚视为奇装。民国二十几年间，全市缝制西服的店铺，不过三、四家，穿这种服装的，大都是军政界，以及服务于外国洋行和领事馆的职员。一般商业中人，多是长袍大褂，老式服装。

重庆最早穿西服的华人，出在民国一、二年间，仅只数人。一为白象街“格致大药房”主人罗子昌，即本市号称“被面大王”永兴隆商号梁泽宣的岳丈、医师罗致之的父亲；另一个是“天成福”匹纱号的王和卿；此外尚有在美国领事馆服务的周云甫，广益中学校长杨芳龄。这几个人中，又以王和卿最早穿著西服。

“天成福”是重庆著名的匹纱字号之一，开设在上陕西街中段，即今建设银行左侧，有数十年的历史，在上海设有分庄，趸批贩运，业务较大。最初派往上海驻庄的，便是王和卿，时在清朝光绪三十一年（一九〇五年）。因为他是主人之一，也善办事。上海开埠最早，繁华盖于全国，十里洋场，五色迷漫，置身其间，易受感染。内地商家派往驻庄，

俗称“庄客”，是很令人羡慕的阔职，而到上海出庄，更是“优缺”，必须与主人关系密切，深受信任的才能派去。

王和卿在上海长驻数年，一经与外界接触，各种见闻自然比内地不同。早年四川交通不便，十分闭塞，新风气传达不易，一经在上海住留，思想认识自然大大改变了。

为着交往方便，同时又适应当地习俗，王和卿便改着西服。其人体格虽不高大，但却十分魁伟，皮肤白皙，眉毛浓黑，一脸络腮胡须，配上西装革履，很象一位十足道地的外国人了。

民国元年，他由上海回到重庆，主持重庆的业务，为商界各行庄“赶场”（做大宗交易）的时间，上下陕西街一带，各家店号川流不息的有人来往，接洽交易，探访行情。“天成福”是当街门面，王和卿昂然坐在门首的会客室中，不时送客到门口握别，往来行人见他的穿着长像，莫不引起注意。所谓少见多怪，商场中人竟称他为“王洋人”。

当时四川军阀混战，连年不息，各地灾荒频传，重庆城内外，经常发生各派军队战斗，为了维持地方安宁，保全城市生命财产，商界累次出面调停。因此商会经常召集各帮，共同筹集一批款项，作为军饷慰劳。王和卿是商会会董之一（当时商会是会长制，设会董若干人，相当于现在的“理事”），因他颇能言语，擅长交涉，便公推他出城到郊外战场，或巷战时在城内，以商会名义出面发表声明。当时的一般军人，每每误认他是洋人出来接洽，立即停止战斗，听其指示（当时地方发生战斗，经常有本地的各国领事、教会中的外国人出

面调停，一般军阀，慑于外力洋势，深恐撞祸，莫不立即停止战斗）。这样有趣的事，不止一、二次，于是商会竟公推他专门干这件事了。

四川防区制时代，重庆已是商埠，水陆交通发达，商业繁盛，算是一块“肥肉”，筹款集资，都得依靠本地商会。因此，各军的头头，无不注意着会内的几个代表人物（会董），有时斗争激烈，或急于索款，竟把会董软扣留下来，或干脆逮捕。所以有一个时期，如会长李星五等外出，大轿后面，特地雇用了马弁（卫兵）数人，佩带武器，以防不测。然而王和卿却因很像“洋人”之故，不必担心意外，自行单独行动，毫不拘束。附近城郊一带，住有不少贫苦人民，竹棚篾舍经常发生火灾，一家失慎，迅即燎原，数十百户房舍转眼化为灰烬。每当灾后，例需急于帐济，本地慈善团体，如红十字会、善堂（民办慈善团体）等便筹办一批饼子（锅魁）、稀饭前往灾场救济；王和卿也常代表商会前往，而一班人竟也误认为“洋老爷”到临。于是“王洋人”之名，不但著称于商场，其它各处也这样称呼了。

1947.9.23—25《重庆夜报》

重庆新闻界第一奇人刘玉声传奇

公孙龙

一

假如刘玉声长在美国，就不会写出闻名世界的“信不信由你”。

刘玉声满脑子都是“信不信由你”的材料，任举一条都可打倒。

在中国，刘玉声写了廿六年的“信不信由你”，但是他的声名不出重庆，读报的人仅知他会写重庆掌故，足够人们茶余酒后消遣。不读报的人，根本不知道刘玉声为何许人。但你提到王秉诚，大家都知道他是位名震川东的说书大家。

刘玉声做了廿六年的新闻记者，但养活他的不是一支生花妙笔，而是一副灵活的嘴舌。他的本业是记者，说书是他

的副业，现在副业的收入超过正业收入十倍，于是刘玉声每天为四家报纸写完文章后，就用王秉诚的名字到茶馆中去说荒唐的蜀山剑侠传。

二

说起刘玉声的身家，也应该列入“我们从前……”之类的。

刘玉声以重庆通著名，他的原籍是江西吉安府庐陵，诞生于重庆。那时重庆陕西街一家红得发紫的票号（相当现在的银行）叫萧怡丰，就是他父亲主持的。

不消说刘玉声幼年的生活是很美满的，他在家庭温室过着公子哥儿的生活，饮食起居有专人服侍，读书学习有专人指导，家庭就是他的一切。

民国十一年“五四”的新风气吹进四川来，触动了拘管在家庭温室中的刘玉声，他浮起一个朦胧的新愿望，到省外去读书。

刘玉声在家中受的教育如何呢？除了国文外，就没其它的了，匆匆忙忙在重庆小梁子英年会补习了几天英文，刚刚认完廿六个字母，就跑到上海去了，在上海投考学校处处碰壁，那时又无“护航”“写题”之说，刘玉声惨了。

幸好四川另一怪人何鲁，正在上海主持中国公学，刘玉声以同乡关系去拿言语，在中国公学做一名不要学籍的旁听生。

那时刘玉声就开始给重庆一家最老的报馆——商务日报——写通讯，拍专电，开始了记者生涯。

三

刘玉声在上海为商务日报帮忙，原系玩票性质。民国十二年，他回到重庆给商务日报编副刊，才算正式下海。从此他与新闻事业结下不解之缘，到现在足足干了廿六年的穷记者。

廿六年来，刘玉声干过多少报馆，他自己也记不清了。记者有天同他在茶馆中闲谈，信笔记下他一段谈话。

"例如：商务日报（1922--1923年），电影报（1922年，青年会主办），鸣算日刊（1924、1925年），公益晚报（1925、1926年），东方晚报（1927、1928年，自办），重庆晚报（1928、1929年），国民快报、国民新报（1930年），长江时报（1931年），上海晶报（1931--1937年），南京晚报（1938年），新民报（1939—1943年），新华时报（1946—…），大中日报、重庆夜报（1947—…）。其它只作过短期的报纸记者，多得我自己都记不清了。"

刘玉声在这廿六年的记者生涯中，他的工作永远是编副刊，写重庆掌故。民国廿六年，他重返商务日报编"本地风光"，主持读者信箱，对重庆任何小事都答得清清楚楚，因此获得"重庆通"的声誉。

四

这不过是二、三个普通例子。

有天，记者偶然和刘玉声谈起重庆投济特捐名列第一富翁黄明安，他就说出黄氏有一怪癖。

据说，黄明安一年三百六十五天，天天要请医生诊断，要吃一剂药。这习惯已保持很多年。最近一年来，由经常诊断他的医生建议，在家中设了许多瓷缸，凡是吃过的方子，都贴在瓷缸上，里面盛着已配好的药，现在已储存好几百剂药了。从此，医生每天切脉以后，就在储药室内反复推敲，最后用手一指，“今天吃这剂药”，黄氏就把药取来熬好吃了，又把空瓷缸照方配好新药。

“他莫非有病，为何要这样？”记者忍不住问。

“谁知道，这类怪人重庆多得很哩！”

于是刘玉声举出小什字筷子街有位姓杨的，三伏热天要烤熊熊的炭火；玄坛庙有位姓吴的，每次理发要花五天功夫……。

这些奇人奇事，在刘玉声脑海中俯拾皆是，并且随时可以找出证明。

我的天，假如刘玉声生在美国，*Riploth*的饭碗准定会打破的。

1948年8月11—12日《重庆大众报晚刊》

责任编辑：黎民苏　王钟伦
封面设计：李　巍

重庆掌故　　王秉诚　著

重庆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（重庆市长江二路205号）
新华书店经销
达县新华印刷厂印刷

开本：787×1092　1/32　印张：4.625　插页：2　字数：90千
1986年10月第一版　　1986年10月第一次印刷
印数1—3,000

书号：10114·271　　定价：0.80元

书号：　10114·271
定价：　0.80元